橄欖
OLIVE





編者的話

編委會

香港社會躋身於現代化都市之列。工商業發展快速，市民知識水準提高，社會的結構和組織也複雜起來，隨之而來的，是此起彼伏的勞資糾紛和工業行動。相信大家還記得護理員的「矛盾漸進式」工業行動，和衛生督察的工業行動所帶來的「豬肉事件」！

作爲基督徒，我們對工業行動有甚麼認識和看法呢？如果我們要決定是否參與工業行動時，我們會如何抉擇？這些都是很迫切和實際的問題。有見及此，「橄欖」組織了一個專題小組嘗試對這個問題加以探討。在處理這個主題的時候，我們抱着一個期望，就是希望能藉此引起讀者關注信仰與日常生活的相互關係。

整個專題可以分爲以下的五部份：

㈠介紹工業行動與工會及法例的關係。

㈡簡單地介紹工運在香港的歷史發展。

㈢討論聖經對工作的看法。

㈣討論參與工業行動是否與聖經的教導相違及參與工運應注意的地方。

㈤一個工業行動的個案分析。

在探討這一題目的時候，我們遇到很多困難。一方面是受到組員的接觸面及生活經驗所限制。因着大部份的組員都是學生，故工業行動對我們比較遙遠，使我們很難掌握到問題的重點和核心，很多時候都有不知從何入手的感覺。另一方面，我們很難找到一些合適的作者去寫一些分析香港現況的文章，這反映了香港基督徒對身處的環境缺乏具體的了解和關心，做成信仰在生活上的實踐更加困難。

因着以上的原因，我們無意對這專題作一透徹和全面性的討論。專題裏大部份的文章，都是從較個人性的道德層面作出發點。我們相信除了個人道德層面之外，還可以從群體性，社會性的角度去探討「基督徒與工業行動」的關係，譬如說基督徒群體在工業行動中可以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一些專業性團契如護士團契，教師團契等）。

其實，在近年的工業行動中，基督徒佔參加者的比例必定不少，但是，基督徒的呼聲在那裏？可能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消極性的參與或不參與，而是積極地如何在工運中發揮基督徒群體或個人的影響力，讓我們不再安於作爲沈默的大多數！

由於能力、時間、材料等等問題，我們只能對「基督徒與工業行動」作一些初步的工夫；如果能夠引起讀者的關心和討論，我們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何謂「工業行動」

「工業行動」與「勞資關係條例」

「工業行動」乃是指一群工作性質相同、有同一利益和立場、或同屬於某一機構或部門的人，組織起來，採取某些行動，去爭取一個目標或改善現況，例如：增加薪酬、改善工作條件、爭取較佳之升職機會等。工業行動之形式有多種，例如：怠工、按章工作、罷工等。

香港的「勞資關係條例」將「勞資糾紛」闡釋爲：「僱主與僱員間或僱員與僱員間之任何糾紛或爭議，而係涉及任何人士之僱用或不僱用，或有關其僱傭合約內容或僱傭條件，或對其僱傭有所影響之條件者」

至於「罷工」，該條例所作出之定義爲：

「㈠一群受僱用之人士聯合停止工作；或

㈡由於勞資糾紛而引致任何數目之受僱用人士聯合或在共同默契下，拒絕繼續爲僱主工作，而意圖迫使

①彼等之僱主或任何其他人士或一群人士之僱主；或

②任何受僱用人士或一群受僱用人士，接受或不接受僱傭條件或對僱傭有所影響之條件。」

根據勞資關係條例，當一宗勞資糾紛發生時，最初是交由勞工處勞資關係科進行普通調解。倘普通調解未能導致和解，勞工處處長可任命一名特派調解員負責進行調解。倘特別調解未能生效，港督會同行政局可採取之辦法有三——在各方當事人同意下將該糾紛交付仲裁，或將該糾紛交由一調查委員會處理，或按照該糾紛情況之需要而採取其他行動。

一宗勞資糾紛可能引致貨物之供應或服務之提供中斷，以致嚴重損害香港之經濟或危及大衆生活。爲保障社會人士免受此等影響，條例規定在無可避免情況下得由港督會同行政局頒佈「冷靜期」，着令所指定之任何人士在指定之期間內，取消由該人士發出或代該人士發出有關工業行動之任何指令，以求使該工業行動得以中止，或於命令有效期內得以延遲。

至於公務員的工業行動，最初是交由布政司署銓敍科根據公務員銓敍條例處理。

「工業行動」與「工會」

工業行動與工會有着密切的關係。基本上，只有工會才有能力去發起或召集工業行動，故工會的發展對工運有着深刻的影響。但當然，有些工業行動是「自發性」的；有時，工人也是在發生事故後才組織起來的。

根據香港的「僱傭條例」，僱員有權加入工會爲會員，或充任工會辦事人員，又可以在適當時間參加工會活動，及組織工會或申請辦理工會註冊事宜。僱主或其代表均不得歇止僱員此種權利，亦不得開除、處罰或歧視運用此等權利之僱員。此外，倘若僱主規定僱員不得加入工會，或須放棄其工會會員資格及活動作爲僱用之條件，亦屬違法。

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工業行動正好代表着僱員們團結起來，與僱主爭取較佳的談判條件。僱主擁有生產機械、資金等，僱員代表着勞動力，僱員們團結起來，才能使自己處於一個較爲平等的情況，與僱主進行談判，磋商。這一個觀念，在大部份較先進的國家中，早已被接納爲一正確的方法和途徑。

工運在香港

本世紀初的工運

在本世紀初，香港已有工會的設立，大多是由技工所組成；當時，僱主與僱員的關係相當良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對香港的學生和勞工起着一定的影響，工人比以前覺醒。二十年代初，香港的物價（主要是食物）高漲，引起工人大罷工，要求加薪；一九二二年三月時，有約十二萬工人參與工業行動。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出現了短暫的沉寂時期——尤其是於一九二八年的經濟衰退時期。

三十年代時，經濟復甦，工會的活動也回復正常。但在兩次大戰時期，工會的活動再次沉寂。第二次大戰後，工會的勢力又增強；一九四六年，又因爲物價高漲，引起一連串的工業行動。

工運與政治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香港的工會分成兩派，分別支持大陸及台灣的政權，支持前者的屬於「香港工會聯合會」，支持後者的則屬於「香港工團聯合總會」。

由五十至六十年代，參加工會的人數不斷增加，到了六十年代初達至最高峰。但在工會會員中，基督徒爲數甚少，主要是基於對政治的恐懼。

文化大革命對香港有多方面的影響，也因而導致六七年的暴動。暴動過後，工會會員的數目曾經急劇下降。

七十年代的中立性工會

七十年代時，工會會員人數又不斷的增加，主要是因爲工會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弱，吸引更多工人參加；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爲有很多所謂中立性的工會紛紛組成，而其中又以公務員工會最多，影響也最大。

這些中立性的工會脫離政治色彩，發覺到工會的組成，是保障僱員利益的最佳途徑。七〇年代初期，教師與護士曾先後發起工業行動，爭取本身的權益。其他部門及大機構的工會也相繼成立。另方面，政府也鼓勵公務員組織工會，一方面是便於談判，二方面，是讓多些工會成立，使它們力量分薄。

根據政府統計，截至一九七八年底，本港有三百八十四間向政府登記的工會，其中有三百二十七間是工人的工會，四十二間是僱主或商人的工會，十五間是混合的工會。在這些工會中，親中共的有九十六間，會員人數約二十八萬；親台灣的有八十五間，會員人數約四萬人；中立性的工會有一百四十六間，會員人數約八萬人。全港工會會員約佔香港勞動人口（約一百八十萬）的百分之二十三。

近年來的工業行動

近年來，香港的工業行動好像有顯着的增加，但其實不然。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香港每個工人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在七六年是零點零六天，七七年是零點一十四天，七八年是零點零三天。祇是近年來的工業行動多由公務員發起，故影響的層面較廣，因而使人以爲工業行動有顯著增加。

爲甚麼公務員的工業行動比前增多呢？除了是知識水準提高，市民對自身權利覺醒外，大概還有三個原因：

㈠工會的政治意識隨着客觀政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七十年代後期，左翼的工會基於中國對港澳政策的需要，甚少直接介入香港的工潮；而右翼的工會，多着重宣傳活動，也不介入工業行動。中立性的工會則沒有政治背景，可以爲本身的權益發動工業行動。

㈡在很多行業中，工人的知識水準低，流動性大，對工會的功能認識不多，而且其行業或工會組織流於鬆散，不能發起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相對而言，公務員更能運用工會的功能，爭取本身的權益。

㈢隨着社會的進步，政府的架構也日趨龐大和複雜，政府僱員的人數和職級不斷增多，政府未能於薪酬、升職機會加以劃一，所以不斷產生公務員的工業行動。

聖經的工作觀

△工業的開始

自從始祖亞當夏娃犯罪墮落以後，人類便受到懲罰和咒詛，始祖再不能安享伊甸園那無憂無慮的生活，而需要汗流浹背地辛勤工作，所以工作可以說是人類犯罪墮落的後果。

聖經這樣記載，當亞當偷吃了禁果之後，神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喫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喫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喫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創3:17-19）自此，工作便開始如影隨形地跟人類生活結合在一起了。然而，罪惡所帶來的咒詛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惡劣的工作環境——「荊棘」、「蒺藜」，以及工作時所遇到的苦痛、挫敗和辛勞。

勞苦的工作成為了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同時有着種種不同的表現形式，隨着人類文明進步和文化發展，工作亦漸趨頻繁和複雜，亞當的兩個兒子，該隱和亞伯就已經有着不同類型的工作，『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創4:2）及至挪亞時代，挪亞能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去建造那一隻巨大的方舟，實在是人類工作能力不斷進步的明證。

既然工作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這樣密切的關係，那麽聖經又有沒有提出任何工作的原則和態度呢？本文嘗試翻查聖經，從中窺探聖經給予基督徒關於工作的觀點。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以來，成為人們作息有時的一種生活形態，亦同時反映了大自然之間一種自然運作的常軌，摩西十誡裏面其中一條是：『六日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出20:9）神吩咐我們要工作，也命令我們要休息，神的心意是要我們從勞累的工作中出來，有適量的竭息。工作與休息其實就好比一個緊叩着的循環，每天日間工作，夜間睡眠；每星期六天工作，一天休息，配搭得多麽恰到好處，所以工作與休息，二者皆不可廢，只有休息，沒有工作，休息便顯得了無意義；只有工作，缺乏休息，却又破壞了那整全的律，順應着宇宙中作息的律來看，工作不單是神給我們的一種責任，也同時是一個祝福。

反觀今天生活節奏急促，人人都為兩餐糊口而奔波勞碌，或者超時工作、找兼職、賺外塊，甚至焚膏繼晷，亂了生活的秩序，這是否合神的心意呢？在香港這個地方，商業社會步伐繁忙，許多人生活得日夜不分，飲食無時，弄至身體羸弱、精神萎靡，這可能是社會經濟急劇發展所產生的畸形毒瘤，我們作為神的兒女，是否應該回到聖經的教導裏，看重休息的重要，享受主日的安寧，避免陷入俗務纏身，為工作而工作，為忙碌而忙碌的陷阱裏？

△游手好閒，無所用心，難矣哉

與大忙人的生活形態成強烈對比的是閒懶鬆散的生活態度，聖經的教導也是絕對和明晰的，閒懶不作工基本上是缺乏責任感，聖經更嚴厲地指責這是不敬虔的生活表現，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教會這樣教訓弟兄：『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帖後3:6）保羅在這裏所擯棄那不按規矩而行的人其實就是指閒懶不工作的人。『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麽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帖後3:11）他更直接地指出：『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第10節）這是新約聖經耶穌基督給予我們有關工作的啓示——『安靜作工，吃自己的飯』。（帖後3:12）

聖經所指責的不單祇是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生活方式，它同時也斥責肅懶怠惰的品性，因為懶惰的基督徒使基督的名受虧損。針對問題的本身，除了人們懶惰貪愛舒服的劣根性

NOT contextualised (cf. 2nd △)
Too general

外，沒有智慧地浪費時間和精神也是不對的，其實聖經裏面有一個中心的準則：我們的生活行爲要與基督徒的身份相稱。每當我們容讓貪逸惡勞的心理佔據我們底心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會有虧欠，儘管那是一份十分神聖的職業，神也不會欣賞的。

將這個準則推論到教會的層面看，今天的教會有曾爲過它所肩負的使命淌過血汗和眼淚嗎？保羅曾經非常嚴厲地說：『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着的時候，也是死的。』（提前5：6）這裏，保羅並非特別針對作寡婦的，因爲他也教訓人『要尊敬那眞爲寡婦的。』（第3節）保羅是特別警告當時某些貪好宴樂的寡婦，他們成爲社會上的寄生蟲。同樣，今日教會若要事奉神，却貪好宴樂，作事怠惰而乏勁，「正活着的時候，也是死的。」不過是神國度裏的蠹蟲！

△在崗位上

聖經所描述的工作觀啓示了有關人們的職事。

我們首先要認定工作是神給予人一份神聖的職事。神爲宇宙創造了規律和秩序，祂在不同的人底生命範疇內分派了特定的責任，所以，在每個人個別的生命線上，其實早已經被安排了一個最恰當的位置，以致整個人類社會互相配搭成一幅最完美的圖畫，我們若切切地尋求神的心意，把自己投入最適切的工作中，就是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神在不同的崗位上，有不同的準則和旨意，人倘能堅守職份，按神心意而行，他底生命就得着最適度的調整，能夠在自我的限制之內獲得生命最大的滿足。

上述可能稍嫌有些偏於理論性的分析，但就生活層面而言，唯有當我們意識到某件工作是神所指派給我們的特別任務，我們才會對它產生責任感；我們才會重視神的引導，以神的帶領作爲工作的動力和方向。

其實，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所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大家都是一樣，也吃也喝也睡覺也工作，只是基督徒有特殊的生活方針，『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麽，都要爲榮耀神而行。』（林前10:31）另一個重要的生活原則就在羅馬書，『我們沒有一個人爲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爲自己死。我們若活着，是爲主而活，若死了，是爲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14:7，8）這是基督徒整個人生活行爲的總綱，固然也是基督徒工作的綱要所在，故此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工作的對象和目標，『無論作甚麽，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3:23）

△取悅神？討好人？

從基督徒工作方針引到另一個十分要緊的問題：基督徒的工作動機。

許些時候，基督徒在工作崗位上有良好的表現，往往志得意滿，忘記了所作的爲誰，聖經上的教導非常明確，『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西3:22）基督徒也是人，也有着人的性情和弱點，很容易會爲工作上得到的成功感和上司的一聲讚許而沾沾自喜，在不信的人群之中和同儕的壓力底下，更容易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討好人的表面功夫上，這一切都不乎合聖經的要求，在「凡事爲榮耀神」的大前題底下，這一切都是罪。所以在神眼中工作的優劣並不取決於工作表現的良窳，問題關鍵還是在於以弗所書六章七節：『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將問題推廣一點來說，基督徒工人該有很嚴謹的工作態度和高度的自發性，若果我們在上司或管工的監督底下才能做得好，這又有甚麽了不起呢？討好人的人事實上是存着一種講求實効的心態。

「取悅神」的工作動機是基督徒工作的第一條重要守則，也是唯一可監管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正當地運轉的東西。

基督徒面對工業行動

身處於一個時常發生工業行動的社會中，大家都感受到工業行動所帶給社會的影響；而更令我們關注的，却是弟兄姊妹面對工業行動時所應處的態度。聖經並沒有對「工業行動」或「工會活動」作出甚麼直接的教導，以下我們嘗試利用聖經的原則來對這些問題加以探討。

主人與僕人

在考慮面對工業行動應有的態度時，首先應該探討一下聖經對「主人與僕人」這題目的教導。

聖經上啓示關於「順服」的眞理，常引起很多人的疑問；照聖經所說，基督徒要完全服從上司嗎？基督徒不適宜採用罷工或怠工等工業行動嗎？並不。因爲這樣解釋聖經流於片面。其實，順服的含義是出於自願、甘心和樂意地達成主人的意思；工作有時可以不是出於自願，順服却沒有不是甘願的。

聖經對「主人與僕人」的關係有以下的教導：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三:22,23）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弗六：5）

這兩段經文都有着同一的重點，就是我們在工作上，最終的服事對象是神而不是人，我們工作不是只爲給人看，而是爲着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務。但是，聖經的教導，並不止於此，在這兩節聖經後面，同時有對作主人的有以下的教導。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爲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西四：1）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爲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弗六：9）

聖經在這裏的教導，正如其他有關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兒女的教導一般，是一個雙邊性關係的教導，對有關雙方都作出要求，而所強調的又是主裏的順服及彼此和平的對待。正因聖經所要求的不是僕人無條件、無限制的順服，所以我們不能單方面指責僕人的不順服而忽略主人的不公平和威嚇的態度。

或許有些弟兄姊妹仍然會有疑問：「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彼前二:18）這裏聖經不是要求僕人無條件的順服嗎？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但如果我們繼續看下去，我們會發覺「倘若人爲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彼前二:19）所以，這裏所提到的順服，仍然是「爲良心的緣故」所規範。值得留意的是，乖僻一詞是指道德上的邪惡悖謬而言，而不是指主人對僕人加以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從以上的教導來看，參與工業行動並沒有和聖經對「主人與僕人」關係的教導有所衝突。

從另一角度來看，工業行動根本就已被資方接納爲勞方的一種權利，故參與工業行動也不是一種不順服的表現。

另一個聖經明顯的教訓，就是「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路十:7，提前五:18，太十:10；林前九:14）一連串的經文都在顯示工人理應得工價的眞理。但何謂合理的薪酬及工作條件？有些人以供求關係去決定合理的薪酬，但這只能夠在一個絕對自由競爭的社會才有效。在大企業壟斷市場的今天，供求關係並不能完全決定合理的工資，而工會往往是與這勢力抗衡，使到工人能獲取一更合理的工資。簡單地說，我們不能一般性的討論「何謂合理工資」，而需了解個別情況的獨特環境，如工作的危險性，厭惡性，供求情況，需要接受的訓練，對社會的貢獻，一般大衆的價值取向等等。

公義和平等都是出於神，我們要強調神是我們生活信仰的中心。無論是作主人的、作僕人的，我們的一切作爲都要向神負責任。

參與工運

不錯，聖經要我們順服掌權者（羅十三），但聖經同時要求掌權者正確地運用它的權力；聖經又要我們順服，但同時又要我們爲受屈者伸寃，要我們減除社會的不公平、不公義。

所以，如果參加工會是一個幫助解決勞資糾紛，讓僱主與僱員可以平等談判、磋商的方法時，基督徒工人是應該參加的。以前，基督徒對工會活動懷有恐懼，主要是基於對政治的恐慌；但現在，工會的價值已爲大多數人所肯定，尤其是一些所謂中立性的工會。當然，在參加前，要清楚知道工會的目標和活動，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工業行動的目標

在考慮應否參與一次工業行動時，基督徒首先要做的事，當然是要對事件的眞相和背景有一清楚的了解，察看行動的目標是否正確和有意義；這樣，才不致於盲從附和，做出愚蠢的事。

工業行動所爭取的並不是「眞理」，而是「合理」的事。事情的「合理性」通常沒有一定的標準，也不應由發起工業行動的人來加以釐定。我們只是按着當時的情理、生活環境的需求來界定；當然，與其他單位或行業作一比較，或可得着一個較爲清晰的圖象。有時，還應將目光放遠，看看這行動能否爲社會帶來更大的益處。

基督徒參與工業行動，着眼點應在於維護人的尊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做的，因此每個人都有他基本作爲人的權利，而不應被看待爲機器的一部份，或是被當作奴僕般被人任意剝削和支配。

很多人對工業行動抱着消極的態度，認爲其爭取的目標不外是爲名爲利，有時更不惜犧牲第三者（通常是一般市民）的利益來達到目標。當然，有些工業行動確實是這樣，不過，在未知悉事件的眞相時，旁觀者最好保持旁觀者的態度。

此外，除了消極的一方面外，工業行動也可以有積極的一面。它可以用作來爭取一些較廣泛的目標，如改善工作環境及條件（對公務員來說，這意味着服務質素的提高，對市民是有一定幫助的），或用來改善不健全的制度（例如醫療制度、勞工賠償制度）。

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工業行動所爭取的大多是物質上的利益，例如加薪，升職機會等。當然，物質上的利益也是很實際的問題，薪酬的標準也是代表了僱主對工人的評價或認可（RECOGNITION），而且，有時僱主爲求私利，並不按照生活指數的變遷來調整工人的薪金。不過，正如前述，事情的「合理性」有時是很難界定的，況且，對基督徒來說，物質利益有時並不是首要的人生目標。所以，參與工業行動有時不是一個「可否參與」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值得」的問題。如果決定參與的話，就應該積極一點，因爲這也是一個見證神的方法。

方法和後果

基督徒面對工業行動時，除了要考慮行動的目標外，還要考慮行動的手段是否正確，和行動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我們要確定行動的方法或形式是否違法，或違反工會的會章。此外，我們要確定工業行動不會對第三者有太嚴重的影響；當然，後果的「嚴重性」也是很難界定的。工業行動肯定會對別人帶來或多或少的影響，擾亂了第三者的日常生活；不過，如果是會涉及對方或第三者的人身安全的話，是一定要三思的。

工業行動所採取的方法應爲漸進式的。如果一開始就用最激烈或最徹底的方法，一來是對對方或第三者不公平，二來，也是令到自己沒有後退的餘地；況且，如果成功則可，一失敗，就會是全面的失敗。

在整件事情中，基督徒所針對的是事件而不是人，因此要用冷靜的頭腦加以分析，不應意氣用事，暴力更決不是解決事情的方法。在談判的過程中，基督徒更可以藉着與人和解而表達基督的愛與寬恕。基督徒更應該盡量鼓勵採取使人和睦的方法。

在參與工業行動時，基督徒縱然不贊同大多數人的決定，但也最好不要做出與大會的決定相對抗的事，或故意阻撓別人的行動；基督徒可以向別人解釋清楚，退出行動。在微少而沒有牽涉基督徒原則的事情上，可以透過彼此討論而作出讓步；但在牽涉原則的問題時，基督徒是要謹守自己的信念的。

結語

在面對工業行動時，基督徒間也會有不同的見解和決定，讓我們憑着無僞的信心彼此接納、互相分享和討論，避免互相批評和指責。參與工業行動的弟兄姊妹，也應該與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分享，保持溝通，教會也應該儘量提供幫助和意見。而在參與的過程中，基督徒還可以積極見證神的慈愛和公義。

工業行動個案分析

引言

護理人員要求改善待遇及工作環境不是在一九七八年才開始。但引起市民注意的，却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按章工作、及以後的「矛盾漸進式罷工」、藍新福在「焦點」的說話、華員會與護協之對立……等等。本文之目的，是對這事件作一簡略之敍述，觀察基督徒護理人員在這事件中採取的立場，及其後的一點反省。

事件經過

以下是這事件的經過。我們將它列出來，希望讀者更了解當時的情況，以致更能了解基督徒護理人員的態度。

一九七八年

五月初　　護理人員由可靠消息知道醫務署將會把放射員的一級及二級制合併爲長薪制。護理人員覺得在同等專業職級上，他們的待遇亦應提高。護理人員協會（以後簡稱護協）立即搜集資料並於六月呈上醫務署，以便重新衡量其價值及改善待遇。

十月十三日　　醫務署的建議書中只提到增加升級位，對於薪酬問題並無顯示會改善。護協一致通過會採取局部性工業行動，向當局表示抗議。

十一月廿二、廿四日　　五間醫院的護理人員在不影響服務的情況下舉行靜坐。

十一月廿七日　　因醫務署所成立的調查小組（對護理員的薪級制）的建議書未能在原定限期內完成，護理員便展開第一步的按章工作，各政府診所、急症室拒絕擔當額外及非護理範圍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

一月廿六日　　醫務署的建議書中，說到把各職級薪點增加一至三點不等，並採用重疊薪酬制。護協認爲重疊制是掩飾升級率不妥之方法。經民意調查後，便拒絕接納該建議書。但在兩位行政局議員調停下，終止第一步按章工作。

三月　　護協接受醫務署的建議：將護理員及醫療輔助職級間薪酬及服務條件的事宜直接建議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簡稱常委會）。

十月廿二日　　常委會的報告書由簡悅強爵士發表。護理人員對該報告書不滿，而其中原因包括㈠護士與警務職級比較中，同等學歷（中學程度），受訓期比護士爲短的警務督察，經調整後其起薪點卽高於註冊護士的頂點。警司的薪俸竟與握了半間醫院大權的總護士長的薪俸看齊；㈡與放射員比較下，護理人員顯然不利：

	放射員		護　士		
	二級	一級	護士	二級行政主任	一級行政主任
薪點	17-24	25-37	18-25	26-32	33-37
晉升					
比率	1: 2		1: 8	1 :6	
到頂薪點					
大約年數	1 3			25	

十月廿六日　　護協大會中通過「罷工前示威行動」，但這次行動是在不影響市民健康的原則下實行「七不做」，而重點是在於不做非護理工作及不做超時工作。由十月廿七日起至十一月四日止，如該期間內，常委會及銓敍科未能改善他們的薪酬，便於十一月五日開始「全面性罷工行動」。

十一月一日　　護協與銓敍科代表展開會議，而會後宣佈在十一月五日繼續擧行。但會後雙方因會議內容互相抨擊，以致第二次會議在破裂情況下結束。

十一月七日　　護協宣佈在八日實行「矛盾漸進式罷工」，主要是嚴格執行護士訓練學校所接受的訓練，使病者得到優良之護理服務，並將以往之缺點反映出來，以求改進。而該行動因常委會的報告書已提交立法局，於是便不了了之。

×　　×　　×

我們不打算在此詳細地陳列護理人員所持的理由；及社會人士的評價，這些相信大家都會熟悉。我們關心的，是基督徒護理人員在這事件中的態度。因爲時間倉卒，我們只能訪問了數位基督徒護理人員。將他們的意見綜合，陳述於後。

基督徒的態度

是否有一致的立場？

在這事件中，幾間醫院的基督徒護理人員曾一同研討基督徒在這事件中的角色。其中一次聚會請蔡元雲醫生主講。那次蔡醫生也沒有明確地表示基督徒應如何行動，只是強調基督徒不應採取一消極態度，應採一積極態度，但在積極當中不應過份。行事要有智慧，不失基督徒的身份。所以，這次聚會只可說是一種「提醒」，並沒有表明基督徒一致的立場。

在事件進行過程中，有大約一半的弟兄姊妹參加護協的行動，而另一半則不參加。

參加的原因

長久以來，護士在醫院中沒有地位。工作上常遇到病人和上司的不合作。因爲醫療制度的不完善，常要負擔一些額外的工作（如抹窗、拖地等），更危險的是要執行一些從未受過訓練的醫療工作，如抽血等（有因爲從未接受這方面的訓練，以致抽血時要嘗試六、七次插針才能成功！）。若有甚麽意外，便成爲代罪羔羊，弟兄姊妹長期受着這些壓抑，事件爆發時，便很直覺地參加了。

爲甚麼不參加？

大致上，基督徒和其他護理人員一樣，認爲他們這次要求尊嚴及改善醫療服務是非常合理，而薪酬一方面是實際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是尊嚴的象徵。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參加簽名、靜坐等行動。但有些弟兄姊妹認爲更激烈的工業行動影響病人的健康，有損基督徒的原則，所以拒絕參加。

弟兄姊妹之間的看法

參加工業行動的弟兄姊妹或會認爲不參加的是怕事，只顧空談，影響團結，導致行動的不成功。反之，參加的會被視爲未經深思熟慮，而在群衆的壓力下出賣了基督徒的原則。

別人的不諒解

在上年十一月的「矛盾漸進式罷工」之前，護理人員一九七八年底亦曾進行按章工作（參《橄欖》20期P.28 ）。當時一些基督徒也沒有參加。所以早在「矛盾漸進式罷工」之先，非基督徒已預測基督徒不會參加這次行動。及至事件發生及其後的不了了之，非基督徒對不參加行動的基督徒抨擊及仇視，因基督徒佔護理人員的大約十分之一，所以有些護理人員更將行動的不成功歸咎於基督徒護理人員的不參與。他們通常的指責是：「加薪時你們接受不接受？」

照目前情形看來，其他人不會諒解部份基督徒的不參與。解釋愈多，仇視反而更大。

就事件的發生和以上的討論，我們有以下的反省：

①在護理人員工業行動這事情當中，我們不應該停留在一些抽空的大原則，而應該把那些原則落實爲具體的教導。不然，信仰豈不是成爲一些抽空的大原則？對我們的生活又有甚麼影響呢？

②參加的和不參加的應該彼此諒解，接納。這是建基於我們有同一的信仰，相信彼此同受一位聖靈的引導。但這接納不應該成爲我們草卒決定自己立場的藉口，更不應該因而放棄落實尋求合付聖經眞理的具體行動。

③大部份基督徒護理人員所不能接納的是病人的健康受到影響，弟兄姊妹應該於事前將這一信念表達給工會。事前的沉默及事後的拒絕參加，難免會給別人一種「不付代價，坐享其成」的錯覺。

④今次事件，從靜坐，按章工作及至「矛盾漸進式罷工」，顯示護協是採取一循序漸進的策略。基督徒可以向工會施加壓力，要求採取更使人和睦及不影響病人健康的手法，如於放工後到督園府請願，靜坐等等。

⑤「矛盾漸進式罷工」，雖然影響到一部份病人目前的健康，但如果能帶來醫療制度的改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是對病人的健康有利而非有害。

⑥改善香港的醫療制度，不單是基督徒護士的責任，也是一般基督徒應該關注的問題。但是，基督徒醫療工作者（如醫生，配藥員等），有他們獨特的責任。

⑦如果我們不是以改善醫療制度作爲爭取加薪的手段。在薪酬事件平息後，我們仍然應該繼續爭取醫療制度的改善，在這件事情上，各專業團契實有其帶導的責任和作用。

結論

我們必須承認這次採訪可能只是提供了片面的意見，我們所提出的反省可能會面對很多現實的困難，有一部份，可能也曾經嘗試過，但結果失敗。如讀者發現以上所記與事實有所偏差，敬請指正。希望這篇個案分析，能夠幫助讀者感受到工業行動所給與我們的挑戰，和我們應有的反省和態度。

專題小組

基督徒與工運

馮煒文

工會與香港教會一向都沒有甚麼關係。傳統上，工會只是與工廠工人有關，而教會內，工廠工人絕無僅有。所以教會很少為這問題查考聖經，作神學反省。直至今日，香港教會出版書籍沒有一本論及信仰與工會的關係。

但在這數年中，香港白領工會興起，特別是在公務員中，而教會內公務員人數却不少。於是基督徒應否參與工會及工業行動的課題便成為教會的切身需要。這篇文章便是就這些問題提供參考，懇切希望讀者來函反應。

基督徒看工會——理論

(1)罪把人與人分隔。罪既是事實，衝突和不公平也是事實。

(2)工會沒有帶來衝突。工會的設立，不是為了製造衝突，乃是嘗試解決衝突。

(3)工會解決衝突的方法，是建立談判的途徑。工業行動是談判的一部份。所不同的只是場所：由會議室轉到工作場所。

(4)從香港法律及國際標準來說，工人有權參加工會是絕對肯定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廿三條第四項清楚表示「人人為維護其權益，有組織及參加工會之權。」組織及參加工會是基本人權的一部份。

(5)從神學觀點看，工會及其行動是神的工具，在有罪性的社會中，調協人與人的衝突。工會的神學性質與政府基本上相同。所以基督徒要參加工會，在這調協衝突的過程中，見證神。

(6)當然，如同任何人的組織一樣，工會也有罪性。但工會的基本存在價值，是基督徒可以及應當肯定的。

(7)香港部份工會有政治性，是事實，但有政治性的工會並非不是工會。除非該工會的政治性達到一個喧賓奪主的程度，以致該工會不再成為工會，而是一個政治團體。到了這階段，問題便不再是參與工會的問題，乃是參與政治團體的問題。

基督徒與工業行動——態度

(8)工業行動不是製造衝突，乃是有效地把既有的不公平表面化，從而可以加以處理。

(9)工業行動的目標是和好——爭取在談判桌上與資方共訂較公道及較長遠的和好。

(10)基督教的和好，是基於公義。出於壓制的平靜，沉默及消極，不是眞正的和好，只是暴力的另一種表現。

(11)基督教的和好不是廉價的，乃是要付代價的。主耶穌為我們帶來和好，付出了流血及生命。衝突、鬥爭，不是和好的相反，乃是和好的過程，和好的代價。

(12)在不公平的環境中，中立是不可能的。在不公平已經表面化的環境中，不參與抗拒不公平便是鼓勵不公平。

(13)基督徒有敵人不是不妥，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只有與世界為友的人，才沒有敵人。如果我們不肯與製造貧窮者為敵，基督徒不能幫助窮人。我們不能說與被壓迫者在一起，除非我們與壓迫者為敵。基督徒在世上有敵人，只是我們要愛敵，不是毀滅他。同時，在基督徒觀念中，敵人不是永遠的。今日是敵人，明天可能是友人。

(14)基督徒參與工業行動，是為自我利益，也是為了家人，現在及將來同事的利益。自我利益（SELF-INTEREST）不是等於自私（SELFISHNESS）。兩者的論理性質甚為不同。自我利益是：「沒有他人，我得不着更大的保障。」自私是：「他人是我的工具。」

⒂基督徒參與工業行動，是爲金錢，也是爲權利，更是爲尊嚴。爲尊嚴也就是對資方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們都有同一的創造主。我不能容忍你單方面決定影響我及我家人的事。我們要認眞地談判。」

⒃工人在香港進行工業行動，是迫不得已之舉，絕不是輕描淡寫的隨便行徑。資方的反對，法律與警察的威脅，輿論的壓力，家人朋友的看法，個人的顧慮，處處使工人再思三思而後戰戰兢兢地投入。這種個人的內心狀態，接近保羅所謂「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的標準，不是局外人可以輕易說教式地論斷的。

⒄任何工業行動都免不了傷害第三著，尤以公共事業爲然。但以工業行動去矯正不公平的情況，除了能保障工人利益，建立勞資和平外；長遠觀之，更能爲大衆帶來較公平及和諧的服務制度，這對第三者亦同樣有利。

⒅但是，無論遠景後果如何，工業行動必然帶來即時的社會不便，及傷害第三者。這道義上的負擔，落在工人身上，也同樣落在資方身上。兩者都有責任。就公共事業而言，政府對市民的責任，重於公務員對市民的責任。

⒆工業行動必然影響第三者，特別是在公共事業方面。但工人仍然有責任盡力減輕傷害的程度。方法是預早通知資方，讓資方有時間向第三者提供後備服務。另一方法是規限服務範圍，爲危急情況提供特別服務。規限的準則不一，但生命的保障，是毋庸異議的。

⒇在勞資發生衝突的情況中，勞方應看第三者（或社會大衆）爲友而不是爲敵，彼此有一致利益。在教師工潮中，教員與學生及家長利益相同，而不是對立。護理人員及病人關係亦一樣。這理解在設計工業行動的過程中，極爲有用。

(21)最基本的分析，是看工業行動爲勞方嘗試把民主帶進勞資關係的領域裏，從而使社會權力分佈較爲平均，迫使既有勢力向一般市民負責。在這個社會民主化的過程中，人人都要付代價，包括接受因工業行動所帶來的不便及傷害。從這角度來看，「第三者」是不存在的。

(22)基督徒在工業行動中，與權勢對峙。但也要進行自我對峙，以免墮入自義，自傲及疏離（ALIENATION）的心態。

(23)在勞資衝突中，勞方的意見未必一致。同事間，領導與基層間，亦會有矛盾。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理解，是彼此都是同一陣線，不是敵對。處理意見不一的方法，也是以此爲出發點。

(24)既然在同一陣線，我們便絕不能因意見不一而分裂，反而要找方法容納不同的意見，擴展團結面。人人的個性及表達方式不同。做領導的要找方法，使不同的人能夠參與行動。要設計多種的行動方式，造成最多人參與工業行動的局面。

(25)基督教認爲人人都是罪人，也是被罪所壓制者。工會領導人也不例外。尤其在衝突的環境的壓力下，人的罪性（勞方與資方）更容易表露。基督徒的責任，不是要求完全的領導人，乃是鼓勵支持領導人。

(26)工人所能要求於工會領導人的，是領導人準確地反映工人的意願。即是行事民主。在勞資糾紛中，民主就是按工人所給予的權限行事。領導人能達到這準則，便是盡忠職守，理應獲得工人的支持。

(27)基督徒要順服神，這是不移的道理。但讓我們再思三思，才引用這信念來拒絕與同事共同進退。基督徒對優次觀念，應弄得十分清

楚。在最重要的事上，讓我們是就說是，不就說不。在次要的事上，讓我們討論互相讓步。在不重要的事上，處之泰然。必須避免的，就是把一切事情都原則化。

(28)除了在最重大最基本的原則問題上，基督徒與同事間的異見不應達到分裂的後果。應該在內部解決。基督徒有責任向工會提供意見及批評。但「先知」的職責不是寫一篇評論文章，刊登於報。乃是在確實參與的情況下代表神向當事人說話。基督徒批評的目的，不是滿足自己的操守（INTEGRITY），不是向局外人表明自己的立場，乃是向同事「以愛心說誠實話」。

(29)工人基督徒要影響工業行動，必須在參與的情況下進行。參與越早越深，影響力便越大越易。若到了千鈞一髮之時才表示意見，已經沒有用，甚至有反效果。若到頭來不參與，則工業行動最後成功或失敗，不參與者都要受到同事的責難及白眼。

(30)工人基督徒的首要見證對象是同事，不是資方，不是社會，也不是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的行動，除了向神負責外，便是向同事負責。我們除了要向神解釋外，便要向同事解釋。對工人基督徒來說，與人和好，即是工人團結。在工業行動中，基督徒的見證，來自強調與同事團結，不是來自強調信與不信的差異。

(31)工業行動是集體行動。集體行動會產生集體壓力，使個人認同。這種情況，若是以武力或威脅的手段進行，自然不妥。但在一般情況下，集體壓力是集體行動的副產品。從中產階級的眼光來看，集體行動甚爲不妥。因爲中產階級重視個人發展。以「出人頭地」爲成功的唯一途徑。但在勞動階層來看，集體行動却是唯一的保障。個人的成功完全靠賴整體的成功。其實，集體行動的倫理價值很高，透過集體行動，膽怯自私的個人成爲勇敢互助的個人。

(32)基督徒不喜歡用集體壓力。但在我們定它的罪之前，讓我們再三思想我們是否無意中已經接受了中產階級及有中產階級價值的教會的集體壓力。基督教信仰重視群體（COMMUNITY）。我們個別被召，但不是被召爲個別信徒，乃是被召成爲基督的身體，神的子民。群體反對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也反對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同時也是兩者的答案。

(33)在工業行動中集體壓力對聯合行動有其作用，但有時也會損害團結。集體壓力可能在工會或在團契中有損人與人的關係，使少數人放棄積極，失掉歸屬感。基督教信仰重視人的尊嚴。基督徒在工業行動中的特別貢獻，便是在壓力的環境中培養或塡補人與人關係上的需要。這不單保障人的尊嚴，也有助於工人團結。

(34)在工業行動中，信徒之間亦會有不同意見。這就是彼此接納的機會。彼此接納就是「不彼此論斷」，「不叫你的善被人毀謗」，只在「神面前守着信心」。

(35)勞資衝突的環境不是「世俗」的環境，乃是基督徒實行神的使命的環境。在利益衝突的環境中表彰基督不是易事，教會一向忽略了。在學習過程中，讓我們「仰望爲我們創始成終的耶穌」，謙卑地認識我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在讀經，祈禱、團契、見證中，與神與人坦白坦然地交往，走進信仰的深處，生命的成熟。

本文轉載自「信息」月刊

經濟衰退對教會的挑戰

張煦羣

挑戰與抉擇

在未來的半年至一年內，香港的教會將再一次面對一項挑戰。如果教會能把握這次機會，她或許能夠重新建立勞苦大衆早已對教會失去的信心。否則，她只會再一次證明自己是個不關心的鄰人，信仰只是有閒階級的玩意。

去年九月，政府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在第三季的失業率爲3.4%（即七萬四千六百多人），比前一年同期的2.7%（即五萬五千六百多人）多出了0.7%。而在今年三月的失業率則爲3.2%，表面上是減少了0.2%，但分析之下，事實上則是增加了0.2%（詳情見後)。有許多跡象顯示，香港正面臨自一九七四年以來另一次經濟衰退。香港工人再一次面臨失業的威脅。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的教會一直維持穩定的增長，但福音並沒有在廣大的勞苦大衆中生根滋長，加入教會的，大部份都是中產人士，中產階級雖然在香港社會中只佔百份之十七（註一），但在教會中，中產階級却佔了百份之八十以上。雖然過去幾年來有那麽多大型群衆性的佈道運動，如葛培理佈道大會，新生命運動……等等，這些運動的目標是針對廣大市民的，但今日的教會仍未能進入普羅大衆中，今日的教會仍是中產階級的教會。更重要的，對許多每天都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難與危機的人來說，教會祇是在往耶利哥路上繞道而行的過路者（路十：31）。

噩耗的徵兆

雖然官方一再強調百份之三點四的失業率是季節性增添大量畢業同學找尋工作而造成的，無需引起長期性的憂慮和恐慌。但事實上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在這七萬多失業人士中，其中只有一萬九千人是初出來找事做的，這大概代表剛畢業的人數。撇除這些因素後，失業率仍達百份之二點八，是一個可觀的增長（增加了11,000多人）。今年三月，政府發表數字顯示失業率爲3.2%，但因爲九月是學生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所以數字偏高。在三月，初次找尋職業的減爲二千九百多人，故此減上剛畢業的，實際失業率躍至3.0%，比九月時的2.8%又升高了0.2%。

在建築業中，工資已經停止上升（物價指數却沒有），有八個工程的工資放緩，三個工程的工資下跌。而雜工來說，現時一個星期只有三、四天工開。

佔全港產業就業百份之三十的製衣業，在今年第一季，因美國的經濟衰退也開始放緩，今年首季輸美貨品總值是增加百份之九。在這兩三個月來，有一半的製衣工人是在半停工或停工狀態的。

飲食業的萎縮最爲明顯。在過去幾個月，已經有三十多間酒樓倒閉，此外又有另外三十多間酒樓改組裁員。

			失業率
附表：	1978	9月	2.7%
	1979	3月	2.3%
	1979	9月	3.4%
	1980	3月	3.2%

心有餘悸

這些事實都令人回想起七四、七五年的大衰退期間的情況。當時失業率估計高達百份之十三點九，共有二十一萬人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註二）。

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廿六日深夜，一個製衣雜工因爲失業數月，深受刺激，竟縱火自焚慘死。而同樓的數百人則要在深夜狼狽逃生。另一名四十多歲的塑膠工人失業數月，因爲求職心切，竟向市政局一名職員行賄，希望能獲得一份防止蚊虫組工人職位，爲廉政公署拘控，被法官判入獄六月。

更有許多人因生活無着落，挺而走險。七四、七五年間刧案率急速上升，而踏入七六年

後，縮頸之風氣漸漸消除。這些戲劇性的轉變並不是甚麼道德敗壞或者道德復興可以解釋的。其實這些不平現象都是受一個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業率——的影響而產生的。不少人的前途，也就這樣在生活煎熬底下，因一念之差而白白斷送了。

以上的都是一些極端的例子，對大部份人來說，他們選擇以沉默渡過黑暗的苦難。對一個丈夫和父親來說，失業不單是經濟壓力的煎熬：房租、米飯、水電、學費，更是對妻兒失責的自疚；不單是麵飽的問題，更是心靈的困擾、自尊的創傷。教會在那段黑暗的日子當中，又何曾做過他們的好鄰舍呢？

教會：無動於衷？束手無策？

七四年的經濟衰退危機戲劇性地出現：石油禁運、能源危機、股市崩潰，教會忽然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充滿焦慮和困惑的社會當中。面對這一危機，教會的反應是混亂和不知所措。

當時的教會明顯是中產階級教會（當然今日也是），在經濟危機當中，她的成員往往不是第一批受害者。對許多政府公務員、醫生、教師、護士、和專業人士來說，經濟衰退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相反，在經濟衰退中，最先被辭退的，往往是半熟練或非技術的工人——這些人大部份都不在教會之內。教會並沒有機會經歷和感受到失業帶來的焦慮和困惑。

因着長時間內向和離世的團契生活，教會也不知如何應付這情況。她對社會各方面感到陌生，不知如何入手，能做到的，極其量只是旁觀者。

未雨綢繆

在剛踏入八〇年代的時候，香港的勞苦大衆再一次面對同一陰影，教會也再面臨同一試煉。

雖然這次經濟衰退不會像七四年的嚴重，但今日壓在打工仔肩上的擔子却比當年更沉重了。過去一年內，通貨膨脹率是十位數字，租金急劇上漲、大量的移民湧入，我們可以想像今次失業的工人並不會比當年的輕鬆。

面對這一挑戰，教會要重新反省，作好準備。在這裏我向各堂會的牧者，特別是在新區或工人人口較多的社區的堂會牧者呼籲：希望他們能裝備好自己，在經濟衰退的日子裏成爲在困厄當中的失業工人的安慰者。

我在這裏提出幾點具體建議：

(一)各堂會的牧者應熟習目前香港各項社會保障及公共援助的細則，以在需要時協助牧區內失業的工友申請領取各項援助。

(二)各堂會的牧者應熟習有關解僱及遣散的勞工法例，經濟衰退時一定會有許多工廠倒閉，遣散費可以濟失業工人一家的燃眉之急，渡過最黑暗的階段。牧者應協助工人追討遣散費，並在需要時，與工友一起與僱主談判。

(三)各堂會牧者應有心理準備在經濟衰退時去探訪牧區內的失業工友，他應事先充份瞭解工人的問題，家庭狀況和情緒壓力等，讓工人在心靈上也能獲得支持。

(四)長遠來說，教會更應該參與爭取更全面的社會保障條例的設立，使工人享有更大的保障。

我在這裏也呼籲一些教會性的機構主動爲堂會組織上述的訓練課程及研討會。我們不應只爲回港的留學生提供就業輔導，也要對千千萬萬的勞苦大衆的職業保障有承擔，否則便有祇會錦上添花，而不願雪中送炭之嫌了。

對失業的工人來說，許多人都可能成爲他的好鄰居，但教會只有一個選擇：好撒瑪利亞人抑或繞道而行的祭司和利未人。今日教會要去證明，基督教信仰不單能使不愁衣食的人能有豐盛的生命，也能使在困厄當中的人有豐盛的生命。如果教會在今天不能好好準備，到危機出現時，我們只能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喫得飽。」

註一：

EPA RESOURCE 第七期　1978 年11月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註二：

工人失業　1975 年　香港　失業行動組。

FALLICIOUS ARGUMENTS AGAINST THEISM

JOSHUA PONG

(IV) THE LINGUISTIC ARGUMENT

編者按：當我們翻開一些哲學著作時，裏面充滿著存有、本質等詞，使我們完全摸不著頭腦。我們可能因此就「妄自菲薄」，自以爲理解能力低，以致不能明白。但根據一些當代哲學家的分析，認爲這些語句若不能和我們的客觀經驗連起來，就不能表達一種客觀的認知意義(Cognitive meaning)，充其量只能表達一種個人主觀的情感。但將這哲學語言分析的方法推而廣之，則很多神學命題也難逃厄運。舉例說：「神是愛」。我們立刻可以問，這世界要發生甚麼事，基督徒才否定神是愛呢？是苦難嗎？基督徒會回答，苦難是神慈愛的另一種表現。當我們繼續問下去時，會發現這世界無論有甚麼事情發生，基督徒都會承認神是愛。這和一個無神論者在任何情況之下說「沒有神」有甚麼分別？任何事情都不能不改變他們的信念！在經驗論之語言分析的角度看來，這些語句都是沒有認知意義的！

以上是利用語言分析來攻擊信仰的典型例子。讀者心裏可能會問：這和語言分析有甚麼關係？在此只能簡單地說：語言分析在這裏的作用，是將語句和經驗世界連起來。

龐自堅先生在下文中會詳細介紹經驗主義者藉語言分析對信仰的攻擊，及指出其理論上的缺陷，全文分兩期刊出，請讀者細閱。

(I)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Strictly speaking the advocates of this argument do not fancy themselves to be atheists asserting the non-existence of God on some allegedly logical grounds. Their onslaught on theism goes somewhat deeper: they simply deny that statements about God are meaningful at all. A sentence like "Two is pennies digging red concept sick in dresses" is of course meaningless; and being meaningless, it can neither be true or proved true nor be false or proved false. There is no point in trying to prove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since it is only a senseless concatenation of words saying or asserting nothing. Statements about God, so it is claimed, though seemingly meaningful, are in fact on a par with the sentence or psuedo-statement mentioned above. Hence people making statements about God, be they theists asserting God's existence and describing God's nature, or atheists denying God's existence, or agnostics expressing their indecision between theism and atheism due to a supposed balance of evidence for both, are really mouthing nothing but nonsense. "And our view," so claims A.J. Ayer in his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is that all utterances about the nature of God are nonsensical."

But on what grounds do they base such a gigantic claim, which , at one stroke, sweep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serious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into the limbo of gibberish? In this century the claim has been made on the basis of two related principles, namely,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and the falsification principle. We shall look at each of them in turn, with considerably more space devoted to the first one.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had been one of the chief tenets of a philosophical movement known as logical positivism. The movement bega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and had been both complex and constantly changing. As a result, it is impossible here to trace all the permutations which the principle had gone through in the hands of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Simplication and selectiveness is therefore inevitable. The principle grew partly out of a very fundamental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classifying statements, which was shared by all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as well as philosoph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According to them, there were only two classes of meaningful or genuine statements. The first class consisted of the analytic or tautological statements, which were said to be necessarily true but asserting or saying nothing about the world. The predicate of such a statement does not tell us anything which has not already been told in the subject. "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 is a good example of such a statement. We have a class of men with a sub-class of unmarried men. We want a single word to represent this sub-class, so we find the word 'bachelors' to do the job. Once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the word 'bachelors' now means that sub-class of men who are not married and therfore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term "unmarried men". Hence when we say, "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 we are in fact saying "unmarried men are unmarried," a clear tautology whose predicated "unmarried men" tell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unmarried men", we are in fact saying "unmarried men are unmarried," a clear tautology whose predicate "unmarried men" tells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s – therefore absolutely nothing more than – what has been told in the subject "bachelors" already. All the statements of logic and pure mathematics as well as those which some philosophers call *synthetic a priori* statements such as "whatever is coloured is extended," or "whatever has shape has size" were considered by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to be tautologies and therefore treated as no different from "bachelors are unmarried men."

The only other class of meaningful statements admitted by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were those concerning empirical matters of fact. Unlike analytic statements which are necessarily and trivially or uninformatively true because of our prior linguistic decisions, empirical or synthetic statements can be either true or false, depending on the state of the world with regard to which they make certain assertions. If true, they will really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world; but, if false, they will give us wro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ld. While analytic statements are true and so meaningful by our linguistic decisions, empirical statements are meaningful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y can be verified by certain sense-experience. "It is raining outside" is a meaningful statement because we know what kind of sense-experience will show it to be true and what kind will show it to be false. If we go outside at once and get soaking wet, or look out of the window and see rain beating down from the cloud-darkened sky, or switch off the radio and hear the tap dance of the rain on the roof, the statement will be shown to be true. But if no one gets drenched, no rain can be seen and no sound of the roof-top tap dance heard and, instead, we find a clear blue sky with the blazing sun staring fiercely down, then the statement will be shown to be false.

Statements which cannot be so verified by sense-experience and are not analytic were considered by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to be meaningless. In other words,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stated that tautologies apart, any statement which could not be verified by sense-experience was meaningless. When the movement first began, verification meant conclusive verification. F. Waismann in his "*Logische Analyse des Wahrscheinlichkits-begriffs*" said, "A statement which cannot be verified conclusively is not verifiable at all; it is just devoid of any meaning." This strong formulation, however, quickly ran into difficulty. It turned out that it not only condemned metaphysical statements as meaningless, which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very much wanted, but it also swept many otherwise very respectable scientific laws into the limbo of gibberish, which they very much did not want.

It is without doubt that the main business of science is the discovery of universal laws which describe certain constant rel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kinds of natural phenomena. To verify such a law conclusively one would have to observe all the instances of these natural phenomena and see that they are in fact related in the way described by the law.

Newton's law of gravitation states that a body of mass exerts a force on another body of mass, which varies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the squar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bodies. To verify this statement conclusively, one would have to observe every bit of material body in the entire history and expanse of the universe to ascertain that the contemporaneous ones are in fact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the way described by the inverse square law. This is clearly an impossible task. It is impossible to go back in time to observe the material bodies which existed ten million years ago and to go forward in time to observe the material bodies which will exist ten thousand years from now. Neither is it possible for any man or group of men to observe the almost infinite number of material bodies of the entire universe at any moment of time. Then according to the strong formulation, the inverse square law along with a host

of other well-established scientific laws would all be so much nonsense. This is clearly preposterous. No wonder Karl Popper, himself very close to the positivists, said in hi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the radical positivists would destroy not only metaphysics, but also science."

The strong formulation had to be abandoned. Consequently, some years later, A.J. Ayer in his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published in 1936, formulated a weak version of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weak version, all that was required for an alleged statement to be meaningful was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experience whice would be relevan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its truth or falsehood. "We say that the question that must be asked about any putative statement of fact is not, Would any observations make its truth or falsehood logically certain? but simply, Would any observations be relevan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its truth or falsehood. And it is only when a negative answer is given to this second question that we conclude that a statement under consideration is nonsensical." Ayer was confident that his weak version would provide sufficient warrant for condemnng all metaphysical–including of course theological– statements as nonsense. These statements are not tautologies because they purport to refer to outside realiti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transcend all limits of possible sense-experience. "It will be found that much of what passes for philosophy is metaphysical according to this criterion, and in particular, that it cannot be significantly asserted that there is a non-empirical world of values, or that men have immortal souls, or that there is a transcendent God."

Unfortunately, however, the weak version as formulated by Ayer turned out to be a weakling indeed: it simply was too weak to banish metaphysical and theological statements from the realm of meaningful statements. Let us just look at the theological statements. It is undeniable that sense--experience of one kind or another *is* relevan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statements like "God exists," "God loves the world" or "God is all powerful." Many philosophers have used the beauty and the orderliness of nature, which clearly has to be perceived through sense-experience, to argue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Others have used the vast amount of seemingly meaningless suffering found in the world, which again has to be perceived through sense-experience, to argue that there is no God or if God exists, He does not love the world. Still other have used alleged miracles such as the healing of an otherwise incurable cancer to show the power of God. St. Paul in Romans 5:8 used the death of Jesus on the cross – an event perceivable only by the senses – to demonstrate the love of God for mankind. It is therefore clear that Ayer's weak formulation would have to welcome all these statements as meaningful, much, perhaps, to Ayer's horror.

Ayer also gave a more technical formulation of his weak version in the same book. In the second edition, he presented the improved technical formulation as follows: "a statement is verifiable, and consequently meaningful, if some observation--statement can be deduced from it in conjunction with certain other premises, without being deducible from those other premises alone." But apart from the more technical dressing, it could do no better than the general formulation: it still welcomed metaphysical – and in our case, theological – statements with open arms. "God loves the world" would be a perfectly meaningful statement according to this formulation, since together with "If God loves the world, I'll help a beggar by giving him $10" we can deduce the observation-statement "I'll help a beggar by giving him $10" which is not deducible from either premise alone.

By the time he issued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book Ayer was painfully aware of this, so in the new preface he presented a very complicated refinement of his rather impotent early version of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He now laid down an added condition that the other premises in conjuction with which a statement must entail some observation statement in order to be meaningful must themselves be either "analytic, or directly verifiable, or capable of being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as indirectly verifiable." Since "If God loves the world, I'll help a beggar by giving him $10" is neither analytic, nor directly verifiable by observation, nor capable of being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as indirectly verifiable, the statement "God loves the world" is now barred form combining with it to entail the observation-statement "I'll help the beggar by giving him $10;" then "God loves the world" would now be ruled out as a meaningful statement.

But then the refined version still let in many otherwise nonsensical statements as meaningful. According to it,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is five feet six inches tall" is a meaningful statement, sinc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verifiable observation-statement "I dislike anything which is five feet six inches tall" we can deduce the observation-statement "I dislike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which is not deducible from either premise alone. A criterion of meaning which can let in such obvious nonsense as meaningful must be a very dubious criterion of meaning indeed.

But there is no need to continue the tedious task of dealing with the individual defects of each version or refinement of the principle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following criticism will expose two radical defects embedded in all versions of the principle and their exposure will show how ridiculously ill-conceived the whole enterprise of formulating the principle as a criterion of meaning had been.

In the first place, we mentioned earlier that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had acknowledged only two classes of meaningful statements. But it seems clear that whichever class we may place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in, trouble will break out.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we may state the principle as follows: tautologies apart, only the verifiable statements are meaningful or all meangingful statements are verifiable. (For the word "verifiable" we may substitute any version or formulation of the principle, e.g. Ayer's general formulation: "entailing some possible sense-experience relevan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truth or falsehood.) Let us suppose the principle to be an analytic statement. Then the principle will be saying no more than that, tautologies apart, only the verifiable statements are verifiable. In other words, the principle will tell us nothing about any real statement at all, since analytic statements, to quote Ayer, "do not make any assertion about the empirical world, but simply record our determination to use symbols in a certain fashion." And in this case, it will record for us that the symbol "meaningful" is, by an arbitrary linguistic decision, to mean what is meant by the symbol "verifiable". If so,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will clearly have no power whatsoever to decide any real statement to be either meaningful or meaningless in the ordinary sense of the word "meaning."

Let us next suppose the principle to be synthetic or empirical. Then it will be claiming that, tautologies apart, all meaningful statements of the world are found to be *in fact* verifiable. Apart from the problem that none of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has shown evidence of having exhaustively examined all the empirical statements of the world, which is an impossible task anyway as was indicated earli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rong formulation of the principle, this supposition suffers from the dilemma of making the principle either circular or self-stultifying. The basic question to be asked is, in surveying the empirical statements of the world, how or by what criterion does one pick out the meaningful ones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then see if they are in fact meaningful? If one answers that it is by the criterion that they are verifiable, then one is clearly begging the question. If one wishes to inductively establish the claim that all swans are in fact white, one obviously cannot use being white as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picking out swans, for if one does, whatever is not white – including black swans – will automatically be excluded as non-swans. Similarly one needs criteria other than being verifiable to pick out meaningful statemen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laim inductively that all meaningful statements are in fact verfiable, if one does not want to argue in a circle, assuming the very thing which one ostensibly sets out to prove. But if one admits and uses other criteria of meaning to pick out meaningful statements, then why should anyone be bothered to establish a criterion of meaning any more? If it is replied that these other ones are not good enough, then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one, namely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can never be any better than the ones used initially to select meaningful statements, since the principle obviously has to rely on the other criteria for its validity. If the other criteria are faulty then the statements picked out will be doubtful in their meaningfulness; then one may be in danger of establishing that all meaningless statements are verifiable rather than the actual principle.

So either as an analytic or as an empirical statement the principle will be in hot water. What if it is considered to be neither? Then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understand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statements, it will simply be nonsense. "If a putative proposition (or statement) fails to satisfy this (verification) principle (fails to be verifiable) and is not a tautology," said Ayer, "then I hold that.... it is neither true or false, but literally senseless." In view of this "tri-lemma" Ayer was forc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his book to admit that in some of the senses of the word "meaning" "a statement may properly be said to be meaningful even though it is neither analytic nor empirically verifiable." In making

this admission, Ayer no doubt hoped to spare the much battered verification principle, which he now called a "definition" and a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the stigma of nonsense. But in admitting other categories of meaningful statements and thus allowing his non-analytic and empirically unverifiabl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to be meaningful he was in fact conceding *total defeat* in the battle to rule out metaphysical and theological statements as meaningless on the mere ground that they are not empirically verifiable as required by his prinicple. The white flag was finally hoisted and metaphysical and theological statements could now full re-possess the bastion of meaningfulness.

In calling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a definition and a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Ayer said that it described "at least one proper use of the word 'meaning'." Some years later in a book entitled *Logical Positivism,* which he edited, he claimed that the principle was in fact a "definition of meaning which accorded with common usage in the sense that it set out the conditions that are in fact satisfied by statements which are regarded as empirically informative". But did the principle in fact describe at least one proper use of the word "meaning" or give a definition of meaning which accords with common usage? The answer must be "no." And here we come to our second criticism.

It seems very clear that in common usage meaning and verifiability are two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s. A child may understand perfectly th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 "the earth is spherical", while not having the faintest idea as to how this statement can be verified. I remember that I had understood th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at statement in my early primary school days, but did not learn how it could be verified until a number of years later in the geography lessons of my secondary schooling. It is utter falsehood for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to tell me that I had in fact not known that the earth is spherical all through my primary and early secondary school days until that day when I learned how the statement expressing that fact could be verified in the geography lesson.

But if meaning is not the same as verifiability, so that a person may clearly know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without the faintest notion as to its verifiability, can it be claimed that verifiability is in fact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meaningfulness? The answer is again "no". There are non-analytic statements whose meaningfulness is clearly beyond doubt but whose verification a logical impossibility. "The univers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even long after living things no longer exist in it" or "material objects continue to exist when unobserved by any observer" are two such statements. They are clearly meaningful but also clearly unverifiable.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ase rules out that there can be observer verifying the statements by observing the continuous existence of the universe after all life (including all observers) has disappeared from it or the continuous existence of material objects when no one is observing them.

It should therefore be clear that verifiability is neither meaningfulness nor a necessary condition or criterion of meaningfulness. But if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is not a descriptive definition of meaning in the commonly understood sense of the word, can it be put forward as a prescriptive definition of meaning? In other words, can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recommend that we should use the word "meaning" to mean what is meant by the word "verifiability" or at least only call a non-analytic statement meaningful when it is also verifiable? Yes, they can. A lunatic can also recommend that we should use the word "white" for what is green and the word "green" for what is brown etc. and that we should only call a statement meaningful when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moon, that is, making moon-referring a necessary criterion or condition for the meaningfulness of a statement. But the point is why we or anyone should accept such crazy recommendations. Since verifiability is not meaning nor a necessary criterion of meaning, to accept the positivists' recommendation is to introduce an absolutely pointless linguistic confusion and an extremely arbitrary reduction of our stock of meaningful statements and discourses. Sanity in this case, as in the lunatic case, must therefore recommend total rejection of such a recommendation.

We may then conclude that while some meaningful statements are in fact verifiable, just as some meaningful statements are moon-referring, the verification principle as formulated by the logical positivists to be the queen and supreme arbitrator of meaning must be regarded as an ill-fated and incredibly muddled dream which cannot but be dashed to pieces on the rock of reality and sanity. Metaphysical and theological statements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fear from it.

◘ 未完待續

對龐自堅弟兄的一點回應

李展强

閱罷「橄欖」八〇年四月號龐自堅弟兄的文章FALLACIOUS ARGUMENTS AGAINST THEISM Ⅱ，願將心中的一點感受寫下與大家分享。這篇感想特別回應龐弟兄的THE POLITICAL ARGUMENT一段（第二十五頁）。

(1)筆者同意龐弟兄的分析方法是合乎邏輯，亦欣賞他能澄清了「神的存在」與「信徒的行爲」二者間的關係。故此這篇回應並非要否定龐弟兄的論點，只是希望就筆者個人的看法提出一些補充。

(2)無神論者的思想體系裏面，未必有道德性之要求，故此我們不能以「有些無神論者作惡」這一事實去否定無神論。正因爲有些人接受了無神論而否定所有道德標準，他們便不需要爲自己的作惡辯護，甚至根本他們不會稱自己所作的爲「惡事」。

(3)然而基督教則有明確的道德標準，不容信徒否認。耶穌說過：「好樹不能結壞的果子，壞樹也不能結好的果子……因此你們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馬太七章十八至二十節）雖然教會或基督徒作惡並不能在邏輯上推翻基督教信仰，但却能引至下列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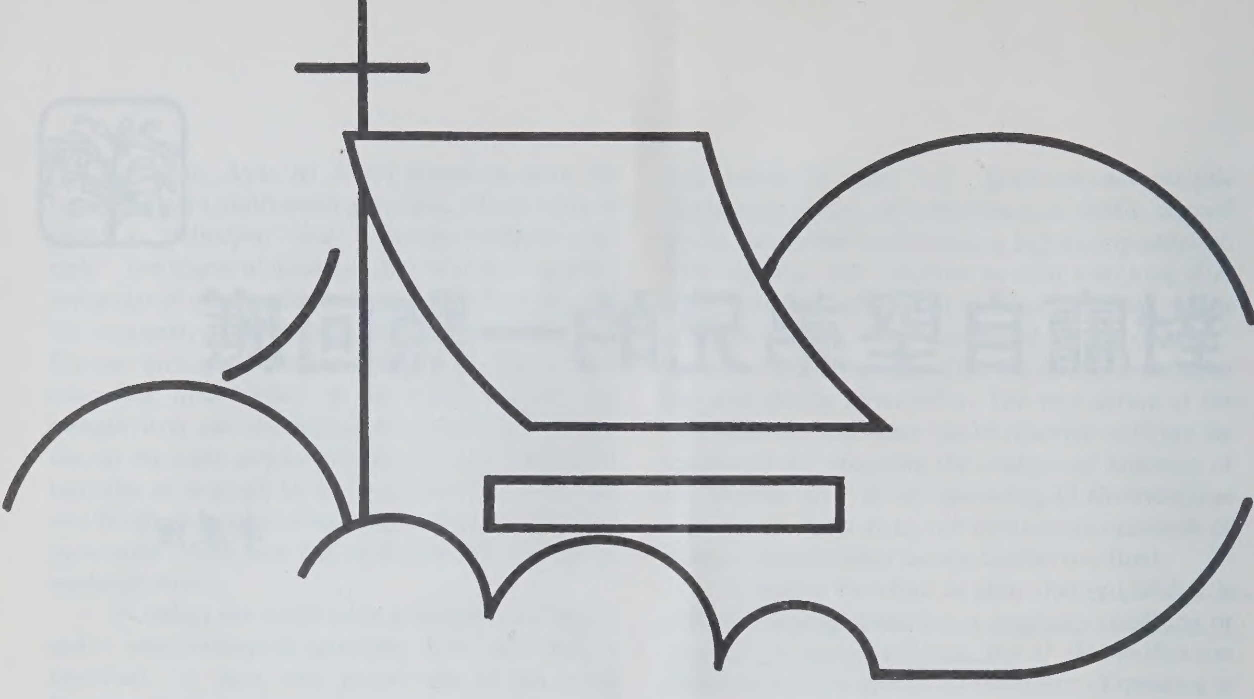
㈠作惡的教會或基督徒並非眞的教會或眞的基督徒。（那麼究竟有沒有眞的基督徒？）

㈡倘若他們仍是眞的基督徒，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耶穌的要求過份理想化，無法在這個世界實行出來。

即使非基督徒接受這些答案，同意基督教信仰不會在邏輯上被推翻，但他們極有可能感覺到基督徒是在自圓其說。

(4)若以「不能用基督徒之行爲去評價基督教信仰之眞僞」這個說法作爲護教工具，在邏輯上是成立的。然而「邏輯」是否人生經驗之全部？舉一個例，一個患有恐懼症的人可能因見到一隻小貓而嚇死，他的恐懼與小貓對人的傷害是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關係，但他對小貓的反應，或者他遇見小貓後所受的影響，是最眞實不過的。人生經驗中，許多事不能單用邏輯去處理。合乎邏輯的論點，亦未必對人生實際經驗有用，例如邏輯不能說服那位恐懼小貓的人他的恐懼是不眞實的。

(5)「不能用基督徒之行爲去評價基督教信仰之眞僞」這論點雖然合乎邏輯，但却有可能成爲基督徒不嚴謹生活的藉口。亦有可能使基督徒忽視了或迴避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挑戰。當馬克思主義者指責教會是統治者壓迫窮苦大衆的工具時，我們的回應是「你不能以教會的表現來評價信仰之眞僞」？還是切切實實地聆聽他們的指責，檢視我們的所作所爲，又尋求聖經有關他們的指責之啓示？頭一種反應是逃避問題。後者才是積極的神學反



省。

⑹若教會擁有大量股票資產，大肆裝修會堂，重建更宏偉、更舒適（例如空氣調節）的聖殿，而世界各地仍有無數難民流離失所，盈千累萬的兒童餓死，教會還能堅持自己是基督徒群體嗎？還能認爲自己不是作惡，或者這「惡」不會損及信仰的本身嗎？

⑺教會不能認爲自己是屬靈團體，其作爲便與社會上的政治經濟完全拉不上關係，這只是一廂情願，自欺欺人的態度。無論教會承認與否，歷來各處的地方教會都在社會政經上扮演某種角色。另一方面，若教會認爲自己是屬靈團體，與社會之政治經濟沒有關係，那麼爲何又認同社會上某些政經立場，例如大量購買股票，或全力支持自由經濟之資本主義？有些非基督徒以社會學之方法分析教會在社會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因而否定信仰之眞實性，認爲教會只是「社會控制」的工具。教會不能以爲這些攻擊不能在邏輯上推翻神的存在便置諸不理。反之，基督徒當更加批判地自我反省（CRITICAL SELF-REFLECTION），從而尋找超越政治經濟利益的方法。

去年粉嶺安樂村因拆卸村屋而引起警民衝突事件，粉嶺浸信教會就在出事地點附近，但教會在這件事上有扮演過甚麼角色？若以自己爲屬靈團體不干涉社會政治事件，給人的印象就是教會只爲了保障自己之安全及利益而已。當然，我們可以不理會這些分析，但這是否能達成福音見證？

⑻邏輯並不等如眞理。經得起邏輯推理考驗的護教學論據，並不一定是眞的。當然，以邏輯命題方式去建立護教學可以讓人知道信仰有「理性基礎」，然而理性基礎會與實際經驗脫節。以邏輯建立的眞理，若沒有具體行動表現，還算不算「眞」？

筆者認爲根本沒有客觀的證據（無論是科學的或哲學的），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證明神客觀的存在。聖經對神的存在，亦只是個「肯定」（ASSERTION）。以邏輯或哲學推理來建立護教學對人生似乎沒有適切性。即使能夠以邏輯推理來證明神客觀的存在，這存在是否對聽者有意義？是否能成爲他的經驗。

適切的神學反省是要從具體人生經驗作起點，而並非以邏輯命題爲依歸。

上面的幾點感受，並非有系統的推論；故它們之間會有重複，亦非針對龐弟兄的論據而作出的反駁，只是筆者看完龐弟兄的文章後引起的連串思想。寫出來作爲對龐弟兄的回應，也作爲挑起更多弟兄姊妹討論有關問題的引子。

罪源上帝

史諾比

我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對宗教有很大的熱誠；在尋找信仰的路途上，我遇到不少的矛盾，例如基督教裏「罪」的問題。

我必須承認，我是一個懦弱的人。正如其他人一樣，我時常犯罪，基督教的信息告訴我，只要接受耶穌爲我的救主，我的罪就得赦免。我在這個問題上反覆思量，却發覺基督教的信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爲我思考的結果，發現「罪」其實起源於上帝本身，這使我對於基督教的整個信仰，產生了懷疑。

以下是我的思考過程，相信必定有不少錯漏的地方，希望各位加以指正，爲我解開這個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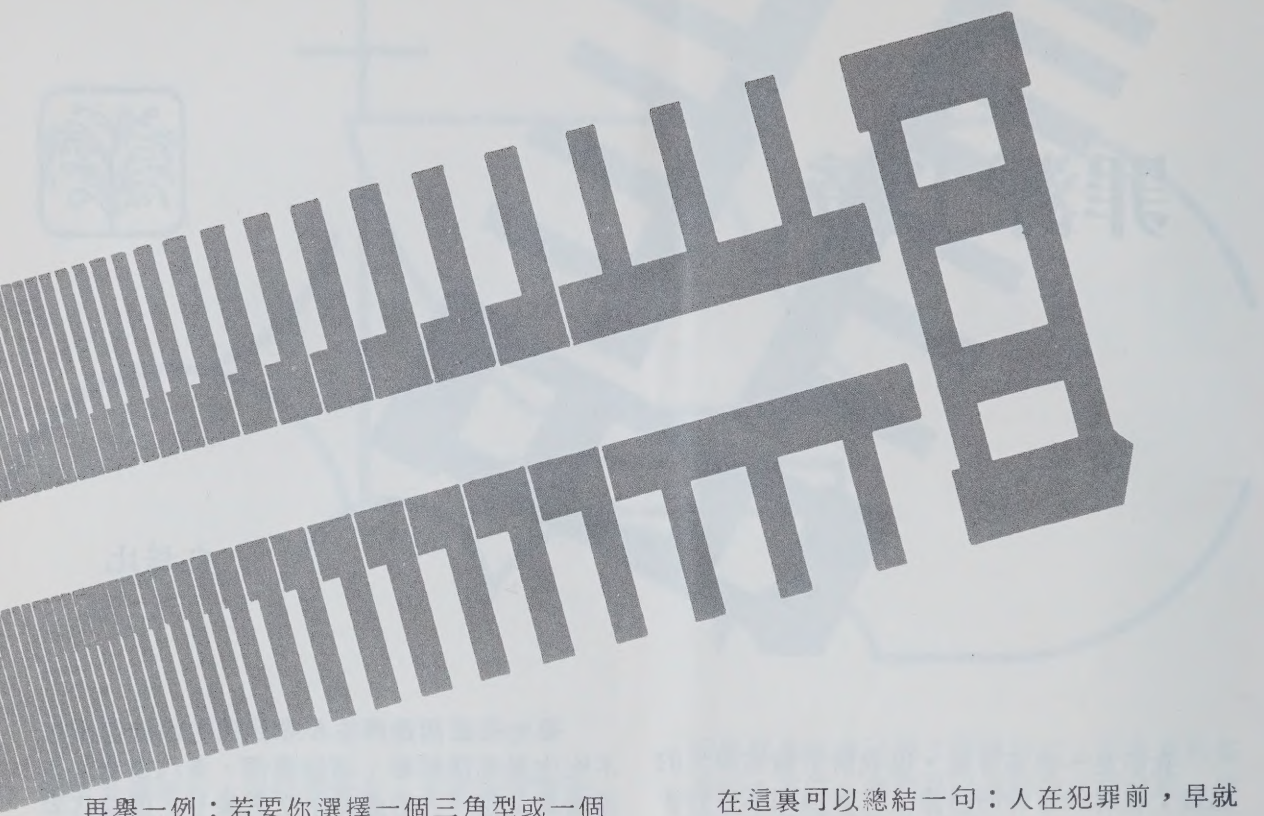
基督徒認爲罪是從人類（亞當和夏娃）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開始的。根據聖經記載，神爲人預備了天地萬物，並將人安置在「伊甸園」內，享受着和平、快樂的生活。

上帝深愛祂所造的人，祂賜予人類自由意志，即是給予人類自由選擇的權利。選擇些甚麼呢？上帝告訴人，伊甸園內一切都可任由人去享用，除了那棵分辨善惡樹的果子，人不可以吃。所以人在伊甸園的最大選擇，就是吃或不吃那果子。

要知道這個選擇並非像我們吃飯後選擇吃不吃生果那樣輕鬆；這個選擇，是代表着人是否離棄上帝。人若選擇不吃那果子，即是代表人選擇順服上帝的意願，願意聽從上帝的吩咐，滿足於服從上帝的生活；但若人選擇去吃那果子，就是背叛上帝，不聽從上帝的話語，對上帝產生懷疑，甚至代表人開始妄想要高於上帝。總之，這個選擇是代表着人類開始犯罪的第一步。

人在進行這個選擇時，是非常明白上述一切的，亦即是說，人明白他若選擇去吃那果子，他是背叛神的吩咐，那是他不應該做的事，亦即是犯罪。起碼，人在做這個選擇之前，就有善惡的觀念，即是說，他有「罪」這個概念。

因爲人若沒有「罪」這個概念，他所犯的「罪」是不成立的。例如一個嬰兒，他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偷」，他餓了，便拿來吃。但一個成年人則知道，不能夠不經他人同意便拿走他人的食物，因爲那是「偷」，是不好的，是「罪」，若做了，便是「犯罪」。但我們斷不能硬說一個嬰兒偷，因爲他根本未有這個「偷」的概念，所以他的行爲不能成罪。所以夏娃不聽上帝吩咐，吃了那果子，既然是「罪」，她在做這個行爲前，必已先存有「罪」這個概念。



再舉一例：若要你選擇一個三角型或一個「四方的圓型」，你怎樣選擇？你根本沒有「四方的圓型」這個概念，是無從選擇的。所以夏娃在未選擇犯罪或不犯罪前（吃果子即是背叛上帝，亦即是犯罪），她對於「罪」早就有認識，不然，她根本無從選擇。

在這裏我們可以說：人在犯罪前，早就有「罪」這個概念。

其實不單有「罪」這個概念，人在犯罪前，早就有犯罪的本質了。若果人是完美的，人的本質是至善的話，人怎可能會犯罪？若有人問：上帝會否犯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爲上帝的本質是至善的，祂怎可能犯罪？

聖經中記載，夏娃是受了蛇（魔鬼）的引誘，便吃了那果子，但我們要注意，這裏的重點不在「吃」這個行爲——因爲「吃」根本不是罪——而是在於夏娃的反叛，甚至是她的驕傲之心，妄想可以和上帝一樣大，而就是這個驕傲之心，驅使她犯罪。若果夏娃沒有這種犯罪的特質（驕傲之心），她根本不會受到魔鬼的引誘。即是假設一個男人沒有性慾的話，他根本就不會受異性在性方面的誘惑。

在這裏可以總結一句：人在犯罪前，早就有了犯罪的本質和認識「罪」的概念。

那麼，這些本質和概念從何而來？上帝既是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一切，當然是由上帝而來的，所以上帝在造人之時，就已經將罪的本質加諸人的身上，而並非人選擇犯罪後才有罪的出現。

由此觀之，上帝至善至聖的本質就受到懷疑了。既然上帝是創造者，世間一切包括人、魔鬼、萬物等都是被造物，借用簡單的數學原理：若上帝是一個全集（UNIVERSAL SET），而被造物只可能是上帝的子集（SUBSET），所有屬於子集的特質，都包含在全集裏，所以我們可以肯定：人犯罪的本質和罪的概念皆來自上帝，亦即是說，上帝的本質亦有「罪」這個特質存在。這樣說來，上帝就不是至善至聖的了。

既然上帝的本質亦含有「罪」，這就無所謂人與上帝之間爲罪所分離，亦無須用耶穌的寶血救贖世人。上帝爲人安排的一切，都變成了空話！

答“罪源上帝”

楊傑明

多謝史諾比君的來信，史君提出討論的問題亦相當有價值；以下是本人的一點見解，不知對史君是否有幫助。

通常「罪」有三種意義：

㈠不信——這是人的意念與神的意念分隔。人不再以神為依歸。

㈡自我提升——聖經中常稱之為驕傲。人不再以神為他的中心，而以自己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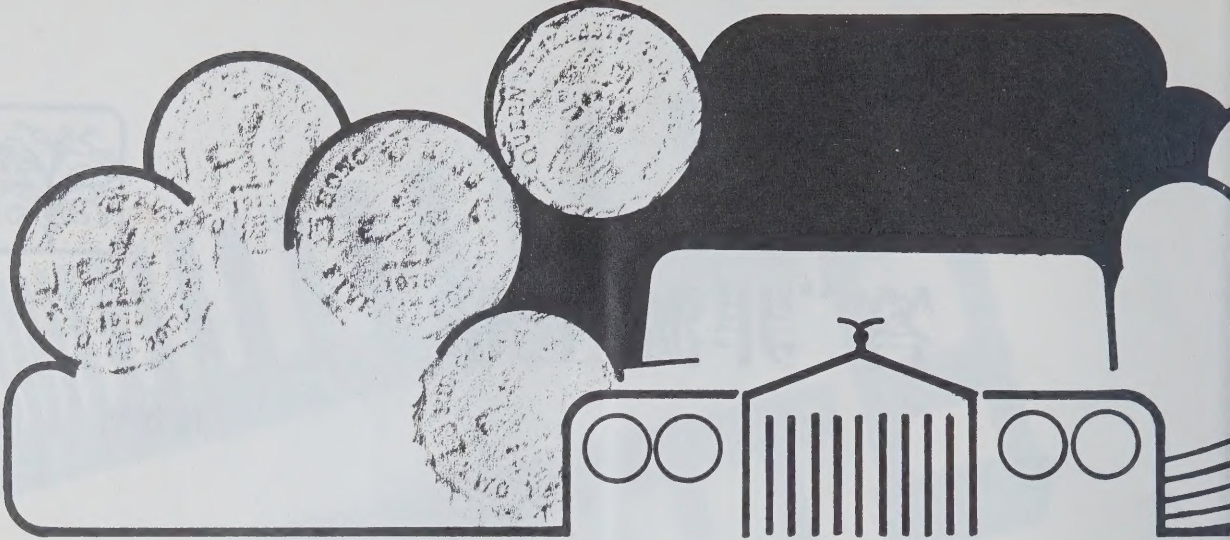
㈢慾望——人離開神後，人本身顯得非常貧乏，因而人渴望吞沒整個世界。人不單以自我為中心，更以自己為整個世界的中心。

歸納上述三種意義，「罪」可以理解為人與神的「疏隔」(ESTRANGEMENT)。這「疏隔」是一種狀況，是人與神之間的一種關係，而不是一件東西或存有物(BEING)。既然「罪」不是存有物，我們便不能談論「罪」的本質，更不能說人在犯罪之前已經有了罪的本質。史君似乎是混淆了「罪的本質」和「犯罪的本質」這兩個詞語。

聖經中記載，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人有神的形像，因而人類似神。這並不是說人和神一樣，而是人有着神無限屬性的有限表現。例如神是全知的(OMNISCIENCE)，人不是全知的，但人有理性去明白他週圍的事物。神是全能的(OMNIPOTENT)而人不是，但人是自由的，在他們可能範圍內他甚麼都能。(這自由令人「可能」犯罪。)誠然神與人之關係不如全集與子集間簡單，即若我們假設神人的關係果真如此，史君的推論仍是不正確的。舉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正方形的集合是四邊形的集合的子集，正方形所有的四邊相等的特質並非四邊形的特質。再舉一個更貼切的例子，綫段(LINE SEGMENT)是綫(LINE) 的子集。從幾何學可知綫是無限長的，而綫段是有限的；綫段只是綫的一個有限投影。綜合上述討論，明顯地人有的一切不都是神有的，而是人的本質所獨有的。

如果我們接受上述罪的意義為「與神疏隔」，那麼神是不可能犯罪的，因為祂不能與自己疏隔。史君在討論罪及犯罪時，似乎假定了有一個善惡的道德律超越於人及神，但基督教相信神本身就是一切價值的依歸，祂也是善惡道德的最終標準。

無可否認，人在犯罪之前已經知道甚麼是「罪」。創世記二章十六、十七節說明甚麼是「可以」、甚麼是「不可」。更進一步，因為人是自由的，他可以揀選「可以」或「不可」；人在犯罪之前已經有了「犯罪的本質」。也就是「犯罪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TO SIN)，亦有人稱之為「自由意志」(FREE WILL)。事實上，是人的神的形像使人能夠在「可以」與「不可」之間選擇，因而他可能犯罪。但有本質的東西不一定存在，如我們可以設想一個三頭六臂的人，但這怪人並不存在。人的墮落就是人將犯罪的本質實現成為存在。當人選擇「不可」時，這「犯罪的可能性」就實現了。這「犯罪的本質」就不再以「可能性」出現，而是一件事實。人要為這個決定負責。正如一個男人不能用他有性慾為藉口去為他的性犯罪作辯護，他是要負起犯罪的後果。



黑夜已深，自晝將近

——獻給港大基督徒團契八○至八一年度職員會

張家倫

從一些ALWAYS TRUE的東西說起

在討論之先，馬太福音廿二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節給與我們一個很好的開始：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可見基督徒的責任以重要性來排列，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對神　神是要求基督徒的委身，把祂看為首位，一生一世追求祂，認識祂，藉着與神同在和與弟兄姊妹相交，漸漸的心意更新而變化，接受神整個救贖的過程。

(二)對人　包括對個人與對社會整體。就針對社會整體而言，彰顯「愛人如己」的具體途徑如下：

(A)傳福音（包括門徒訓練，使人無保留地委身於基督）

(B)社會參與（包括政治參與）

而傳福音與社會參與的重要性應為相等，相信這點在今時今日沒有太多弟兄姊妹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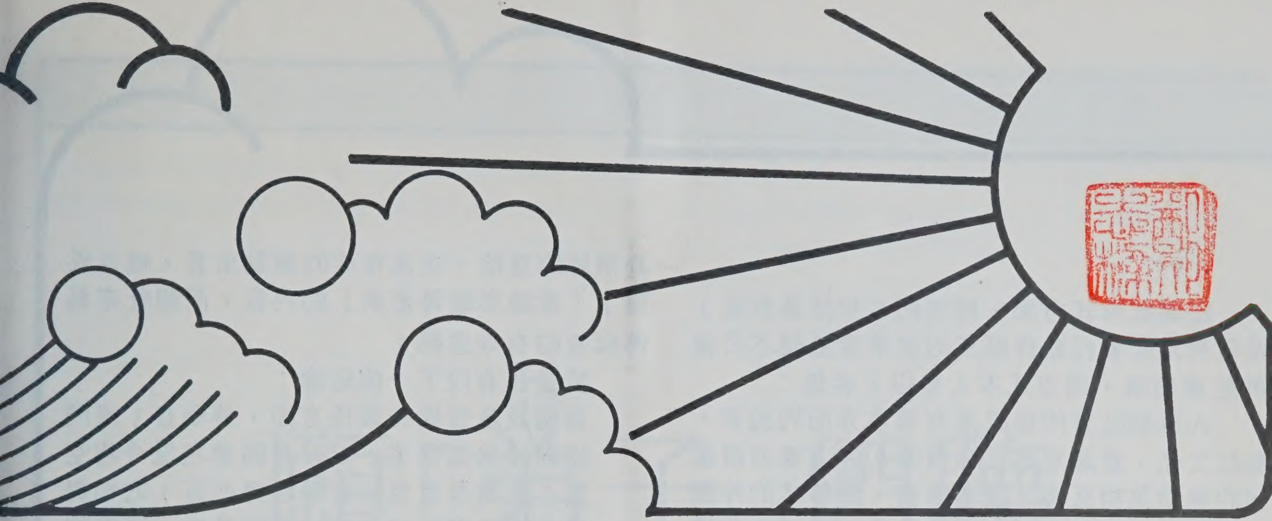
基於筆者在學生會工作，接觸較多關社的事例，所以覺得以社會參與作為切入點討論較適合。

雨季不再來——客觀環境的試析

關社絕對不能是基於血氣，讓我們謙卑的在神面前，接受聖靈的光照，叫我們一班罪得赦免的基督徒在這個年代，這個地方懂得付上一個怎樣的責任。以下有幾點想將討論帶出：

(一)

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基本原則應是：凡合乎神的道／聖經原則的我們應該支持；凡違背神的道／聖經原則的需要改革、清除。在香港究竟有甚麼是違反基督的原則呢？首先，物質主義，佔有式個人主義的衍生給與香港的經濟、政治一個有利的客觀基礎；每個個體成為經濟的附庸，他在社會的經濟價值成為了他個人的價值，貪財的慾望成為了整個經濟活動的最根本因由與動機（這原是自由主義的特色），經濟剩餘的不公平分配，物競天擇的原則引進了不能避免的社會分級和淘汰制，做成了弱者的無助。我們都發現這些是不合乎聖經原則的事物，我們是有責任去把這些「不好」的東西革除。



(二)

好一句「弱者無助」的口號曾經打動了不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關社的熱心，做成了改革社會的基本動力，然而一些非基督徒所倚重的社會兩極分化論（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却沒有預期的在社會出現，他們相信依照(一)的發展模式演變下去，被剝削者人數愈多，資本家的肆意擴張，定爲自己掘下墳墓。然而隨着科技的普及，知識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社會出現了一大批介乎兩極之間的科技官僚層，他們是中產階級，沒有強烈的改革要求。他們重視的是怎樣用現代化的方法去改良整個制度的運作，然而整個制度的本質却沒有任何改變，人的價值繫於經濟價值，物競天擇與淘汰制一點也沒有改變，而且繼續順利的運作下去。

(三)

政府的介入

任意自由的發展到最後定會招致滅亡的道路，近十年來政府的介入却保證了這制度順利的進行，促使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說得具體些，就是去保證被剝削者的生產力能源源不絕的供應着整個經濟制度。例如九年免費教育供應了大批適齡學徒爲經濟效力，民政署的成立給與中產階級一些民主的滋味，滿足了他們的要求。賭博合法化及色情事業的放寬使人們疏離與失落感覺得以發洩。少年警訊，香港電台電視部的成立給與廣大市民一種溫馨的歸屬意識。總括一句，政府已排除了她在六十年代那種危機式政府的形象，社會矛盾面降至空前最低點，於是大家「快樂」的生活在這既定的意識形態當中。

(四)

自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學運主導意識形態崩潰。就筆者所認識的非基督徒學運先鋒份子，大抵上可以歸納他們的思想主導爲：①充滿理想主義色彩②往往有着一種隱晦的社會主義取向（我指大多數）。經過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在歷史舞台備受考驗，她首先解決不了經濟效率的問題；蘇聯在阿富汗的肆意擴張；解放後的越南及柬埔寨所出現那罕有的慘絕人寰暴行，令到越來越多人懷疑社會主義的可行性。然而沒有了社會主義，也可以一大堆正義、公理、和平、仁愛的理想主義口號作爲他們的取向。可是隨着歷史的巨輪，時代脈胳的演變，在今時今日，理想主義已漸告消亡，實用主義提昇，社會（包括祖國）所需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熱情；效率而不是公義。

於是，多少豪情壯志的同學，也如波濤般到了盡頭。多少同學從書本中跳出來，自願放下大學生的榮美，委身於改革，燃燒於理想，到頭來，又懷疑、又失望地重拾書本，回復多年前就已經可以開始的工作上，社會的本質於是一點也沒有改變。一樣是充滿了物競天擇，罪惡、冷漠、疏離……

基督徒，一班蒙神大愛的人，試問又有何感想呢？

福音←→關社??

筆者不能提出一個解決現狀的辦法。
然而以下有幾點想帶出，希望刺激討論：

㈠

在關社形式方面，同學們（包括基督徒）希望利用社會行動件頭式的衝擊着整個不公義的社會架構，這方式本人有以下感想：

(A)整個社會的構成是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文化、意識形態、經濟等。各方都有很複雜的連鎖及相互性。沒有聯繫、游擊式的件頭社會行動總和是不足以構成搖動整個社會架構及其罪惡的客觀基礎。筆者同意改革是需要建造（CONSTRUCT），這可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加上深入而細微的多方工作，才可把基督的公義高舉。

(B)如上文所說，隨着香港社會的繁榮和富足，縱使是生產剩餘分派不均勻，香港大部分居民亦已分享到這恩惠，「路有凍死骨」，「弱者無援」的例子已經不多，社會行動的群衆基礎開始受到懷疑。

㈡

接着「弱者無援」的口號除去，我們現今關社的取向是甚麼呢？筆者認爲：

(A)在現行架構中作出法律式或議會式的向政府施加壓力。這不是我們現階段所能實踐，從略。

(B)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如上文所說在現今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橫流下，個人反而在整個制度中消亡。人是附於經濟，變成了沒有血，沒有肉，只有市場價值的個體，他的餘閑被高度消費主義所佔據。意識形態的再更新和對既定意識形態的批關實在是我們應該最關心的東西，亦爲關心社會一個不可忽略的課題。

㈢

隨着時代的節拍，客觀環境的急劇變動，於是關社的重點亦從針對每個個體肉體上的需要，演變爲針對個體的意識形態再更新以及自身價值的重拾。在基督徒的觀點來看，福音成爲了「意識形態再更新」的內容，而關社亦爲傳福音的有效途徑。

於是我有以下一個結論：

當題及基督徒的責任方面，傳福音（或門徒訓練爲適合些）與社會關懷在現今時空裏（針對香港現時客觀形勢而言）的相對自主性已顯然產生了相當的動搖，兩者的關係與連鎖在今後團契和教會的大方向上實在不容忽視。

（筆者在這裏不相信福音會成爲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統治機器，因爲在眞正委身的過程中，聖靈會叫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叫我們察驗何爲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社會於是更能討神的喜悅。）

從一些ALWAYS TRUE的東西結束

理想和現實在歷史的規律中錯縱交替，互爲功能。往日的學運方式與內容在今天亦應灌以一個新的內容和定義。可能神在這時空中是要求我們這一班屬祂的兒女再次平靜安穩下來，作出一些沈痛的檢討與及對基督教的內涵本身作出一個重新而通盤的再思，或者更重要的，是要來到祂施恩的寶座前，承認自己內裏的不潔與自高，以求祂首先的赦免。往日師兄師姊們的豪情已逝，激情盡去，現留待我們重新去建立，從最基本的委身說起。相信一個能夠榮耀神的團契，也許是旣具備有長遠理想的盼望與胸襟，又能在這些中、短距離的目標顯出堅持與能耐。其實神不要求有甚麼天才、猛人，亦不需要有甚麼驚人之作，讓我們重新向神謙卑，掌握時代的脈胳，爲神完成我們在歷史中應有的任務。

註：本文有部份資料取材自七十年代，學苑。

願「弟子」們聽

文茹

（編者按：本文作者現任教於本港某女子中學，文中透徹刻劃作者三年來教學生涯的體驗，並且對她的學生們提出勸勉的話。）

濃濃的祝福和謝意像晨光一般灑滿了書桌，又是聖誕節了！終於也有可以靜下來的日子！

擁有着這一切祝福，也享受着耕耘後的甘甜。可是盪在心頭的，竟不是滿足與自慰；相反的，一股莫名的孤單已沁入心中，而更高更大的挑戰已無情的擺在眼前，不容許疲乏的我去逃避。

「……還有誰比一隻尋求及遵守有意義和崇高生命的海鷗更負責任！謹祝聖誕快樂！」

試問還有甚麼能比這絲眞摯的謝意更激動着疲乏的心弦？更有力地督促着我要奮鬥爭戰的良心——那是我向神默許的奉獻。

這三年的教學體驗清楚的教導我，教學的生涯絕不是混着好玩的，這是一條孤單無奈的挑戰的路。

我所說的孤單是一股無助的孤單，是一股缺乏認同的孤單，是一股人在耕耘，整個世代在破壞的孤單，是一股痴信腐敗枝芽會新生的孤單；我所說的無奈是承諾背後的責任和實際的奉獻：縱然是一個永恒的苦侍，一場沒休止的爭戰，還是一個沒有別路可選擇的人生路向；我所說的挑戰是這個世代的洪流與你的生命力量的爭戰，是一股向你所立的志向狂捲的暗潮，是一股向你致命的孤單狂吹的暴風。

這原是一條孤單無奈的挑戰的路。

天眞的你，又怎知道自己竟是自己的一號大敵人呢？四十雙求知的眼神一併向你發射，背後原來是一個個獨特的故事，一個個超越你的成熟所能面對的故事。這四十個求完美的心，不自覺的「冀望」你的一個不小心，然後可以安然的拒絕你的理想的教導——那需要付上「代價」的學習；於是你的沮喪、你的憤慨、你的失望、你的焦慮，還有許多因你還是一個有血有肉、曉得去愛去痛的人的悲哀……竟全成了同學們攻擊的鵠的！

當你緊咬牙根，控制那正要迸發的青年的義憤，換上怡然悅納的眼神時，他們會異口同聲的說：「虛僞」；當你坦率的流露着赤子的心懷，讓他們認識你不和罪惡妥協的人生立場，讓他們知道自己不負責任的學習態度是自暴自棄的表現時，他們却換上了另一張面孔，暗暗的說道：「原來他這般情緒化，這般不成熟。」當同學們屢勸不改，你要執行校規時，他們又總會爲自己想出千萬個逃避責任的藉口，一句「老師偏心」便可以從容的抹去了自己的過犯，也自然漠視了師長期待的痛心。

當然，我並不是說在這段日子裏沒有遇見成熟、懂事、肯面對責任和挑戰的同學，老實說：太少了！力量也太薄弱了，許多時候，熬不過同儕價值觀的影響，這些小桃李也傲不過冬寒呢！

在這段冰冷的日子裏，滿懷壯志的自己，確實希望把一腔熱血，滿腔理想獻給這群有盼望的明天。想不到迎頭棒打的却是先去學習接納自己不完全的功課：遇上失敗挫折的時候，原來我只會緊張自己的尊嚴和受挫、懷疑自己的立志和能力，潛意識底下要逃避和拒絕這個責任帶來的一切——包括當中蘊含着的苦痛和快樂、信心和愛心的操練；誠實點說：我在拒絕相信神在我身上要釋放的大能，也在拒順服帶來的「犧牲」。

可是，眼巴巴的看見同學們活在自義的隔絕中，心底中湧出的不再是一份被拒的痛苦，而是一股比被拒還無奈的愛莫能助，一股沒有其他感情可以塡補的孤寂……叫我更固執的期待着春天的新生。

這時候，我才稍稍的摸着神盼望人類自願回轉那遙遙的等待，原來是愛得這麼深、也這麼痛；我眞不知道，幼稚的我，每天刻意的活在自義的過犯中，只看重目前的苦難，而辜負了祂含着無比大愛的管教和琢磨，是怎樣的刺痛神慈愛的心腸，是怎樣虧損了創造的榮耀！又是怎樣的不知自愛自重。

我才明白過來，如果沒有完全的愛，滿有智慧、公義、聖潔的神絕不會恆久的接納和寬恕人的自以爲是。

默念着主的十架，我的學問，我的價値觀，我的高傲，我的失敗，我的自尊，我的青年易激的感情……都混着血淚顯得不重要了，我要謙和的堅守着那隨時會受侵蝕的生活原則——在塡鴨式教育制度下的全人教育理想。可是，每天醒來，只有冷風提醒你：這是新的一天，新的挑戰；你要在這沒生機的灰網上，結上一個春天的彩結，畫出一幅繽紛的彩圖。要在這血汚自賤作了主的世代中逆流而上，又是怎樣的一個功課呀！

無奈這原是我自己迭上要奔跑的路！我確實有過氣餒的時候，不過每當我想到主的鞭傷血痕，想到主臨終的禱告，想到主最終的得勝；想到保羅熱血沸騰的勸勉提摩太這個接班人說：「根據你的觀察……你知道我的信仰、言行和志向，也知道我的信心、愛心和耐心，更知道我為傳福音所受的苦難……你要堅定不移，不怕為主受苦，努力宣揚福音，盡忠職守。」——（當代喜訊提後三章十至十一節，四章五節）在這個不信的世代中，我只有默然不語，朝着那冬日的朝陽，堅忍的踏步，擦一下冰涼的手，總希望藏下這絲溫暖，好有能力向同學們撒去。

我不是絕對無助的。

雖然，這仍是一條孤寂得要死的路。

記得讀教育學院的日子，熱烘烘的一伙人中，當然有混飯吃的一群；不過，還有一撮甘作黑海的提燈客，要在這不健全的教育和社會制度下燃盡自己，和這一代一同面對生命的各種挑戰，指引他們人生的路向。

可是，當我們被拋到這個千旋萬轉的人生舞台上，才實際的認識到所謂教育理想者的悲曲——只是一串麻木冷漠的韻律。普遍來說，一般的老師已屈服在這個教育制度下，甘心作一部出賣知識的機器，而漠視了同學在成長時對輔導的需要；再加上在尊嚴的敏感下，誰會顧慮因師生的鴻溝而導致的各種學習與成長有關的障礙呢？

最沈痛的還是初入門的小老師，在無情的冷嘲和熱諷下，在沒有認同的伴侶，在缺乏同學的支持和合作下，他們也禁不住問一句：「長恨此身非我有」，氣餒下來，敷衍塞責了事，轉去追求別的可以滿足自己的事物；這已不是新聞。試問沒有明確的指引，青少年靠誰來啓迪呢？瞻望明天你不心寒嗎？

這原是一條挑戰的路。

彌敦道上衣冠楚楚的人群，如潮的湧來，也如潮的湧去。在交通燈的指揮下，任性的人兒却順服的散開聚來。閃耀的霓虹，似乎特別眷顧戲院門前的廣告和街頭巷尾坦露的挑逗的體象；還有那十步一間的英皇御准賽馬會，默默地散放着「合法化」的無絕對的誘力。那邊，「油脂」的音樂起勁的搖擺着，歌頌着及時行樂的人生；「油脂」的青年成群的招展着、笑迎着，又帥又灑脫……誰會清醒的察覺笑話後的魔掌，誰會冷靜的接納在引誘下的意志薄弱，雖然明知背後可能藏着黑暗，他們還是要去證明自己的成熟和獨立性，去追尋他們認為的幸福。

報章上大字標題的直刺着——慈母殺子以懲賭夫，母性何在？又或者慈母心理變態，虐待小弱女，弱女何罪？……事實上強姦擄掠，人倫慘案沒有一則是新鮮的，國與國之間的陰謀戰禍，越南、柬埔寨的難民，滯留在伊朗的人質……更叫人不忍多聞！

試問誰人還有摘星星的童眞？

誰人還有勇氣去追求絕對和永恒？

而日夕與共的電視知己，同樣不願放鬆你，主題曲天天的迴旋着：

「人生幾許失意，何必偏偏選中我」

「就算甘願平淡過一生，或者遲早心中有悔」

「變幻原是永恒」

「誰願依約決心等，以待緣份」

難道是大衆媒介擔心青少年缺乏現實知識的灌輸嗎？恐怕我們還是太早的讓他們面對這種種染汚了的人生體驗，在這些似是而非的「眞理」影響下，捲走了無數純摯的追尋腳踪；更可悲的事實，老師們的那一套理想的教導，又那般不切實際似的與他們的言行不相符，同學們更無所適從的迷惘和萎縮了。

這還是一場未完的爭戰。

由家長而來的壓力和不合作，更不問因由的摧毀着辛苦的耕耘。過分的溺愛或漠視；犯錯後的姑息或缺乏價值觀的嚴懲，都同樣不負責任的影響着青少年心智的發展，再加上因家庭關係破裂而產生的問題，又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學們的人生觀。這一大撮的問題又豈是沒有受過專業輔導訓練的老師可承肩？難道又是他一人的責任嗎？

同學們，我在這裏向你們坦露老師所背負的重擔，只希望你們明白一個事實：一株剛從溫室出來的蘭草，四周已要求他是一樹勁松。如果他能屹立不倒，似乎是值得慶賀的事；可是，獨醒的他要面對的挑戰也就因此更多。如果這株小蘭草枯萎了，似乎是人們心中最終的盼望。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嚴謹的教學要求，同學可以從容自欺的學習着；沒有針刺刺的勁松，同學也分不開耐寒的傲質，大家躲在溫室中，不是可以逃避人生各種挑戰嗎？但是，溫室中的老師又不是我們心中所繪畫的理想呀！看，我們多矛盾！

所以，撒滿了冬陽的臉兒啊，在這個缺乏欣賞和尊重的世代裏，你們也有責任去維護一株小青苗，讓他成長起來，多結果子，鼓勵更多需要鼓舞的同學。因此，學習去欣賞那爲你們在夜深還備課，課餘還抽空去明白你，助你走過一重又一重困難的老師；可是，不要忘記老師也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要偶像化了他。

同學們，要知道成長這個功課必須你自己去面對、去尋索其中的眞義，絕不能把這個居於你的責任推卸在老師和家長的身上；縱然在這片荒蕪的地土上，我們的挑戰一天比一天加多，不過，老師今日所面對的挑戰，解決不來的疑難，明天却需要你們去面對，去尋覓解決的辦法——那經啓導後的開拓。

同學們，讓我再多說一句話，縱然我們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這片土地並不適合我們去生長，太蕪雜、太多歧路了；可是，我們也不應停在埋怨制度、師資不好的消極上，要知道我們也不是在溫床上茁長壯大的。我只相信靠着那加給我們的父神，凡事都能作。

一個小桃李的茁成，要你自己付上勇氣的代價，尋覓生命的意義，突破人生灰灰的網囚。

霧中視野

小軟

韆鞦在飛盪，刮臉的寒風吹得滿頭亂髮，鬆開了鈕扣的冷外套不羈地高高飄揚着。我歎了口氣：自己渴想遠離塵囂，連外套也想飛了；不期然地把韆鞦的速度放慢了下來。

四周是個縱橫只有十多步的世界，右邊依稀可見十五號車總站的輪廓浮現，我瞇起眼睛，嘗試憑記憶來辨認在視野以外的山頂餐廳。這麼重的霧，又不是假日，別人一定會以爲我有難得的好興致。我苦笑了一下：跑了出來，下午的課沒上，還理直氣壯呢——身體的不舒服要休息，心靈上有病也該可以休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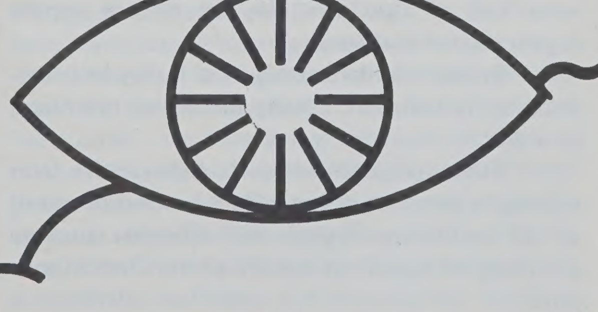
踱下公園石級，摸索到對面的纜車總站去。走進瞭望台往下望，只有白茫茫的一大片，不要說沒有了山和海，連近得可以一把抓住的樹枝也看不到。我無奈地托着下巴，心中滿不是味道；想起自己到山頂來，原是要撇開刻板的生活，讓自己重新得着廣濶的視野和胸襟，醫治一下患了短視病的屬靈眼睛。「甚麼也看不到，眞沒有意思！」

走出車站，不甘心就此一無所得的回去，於是把外套搭在肩上，逆着風在山頂道東搖西擺的繞了個彎，剛好衝着幾個外國遊客在吱吱喳喳地驚歎山下的霧景。我禁不住暗暗好笑：香港的春天本來就是多霧，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順着他們的視線望過去，只看到一重重灰幕似的濃霧，任憑我怎樣看都看不到甚麼。然而，他們孩子氣的驚喜確實吸引我——這跟觀看的人有關吧？

同樣的霧景，看得他們讚歎不已，在我却是毫無味道：「這跟觀看的人有關」。肉眼可以看到很多，但心靈內欣賞眼睛的短視病仍會很嚴重，屬靈的眼睛也是這樣吧？我繼續繞着山頂踱步，四周仍是那個只看得見十多步的世界；撲臉的霧水像紛紛的雨珠，不斷地撒在身上。

廣濶的視野，遠大的異象，似乎都不是可以向外求的。想到這裏，不禁啞然笑了：自己巴巴的騰出時間來靜思，却不好好把握每天安靜的機會；苦心地跑上山頂來求屬靈的視野，却平白漠視了最簡單不過的方法。「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爲愚拙」，讀經祈禱依然是唯一的方法……

我在纜車總站前放慢腳步，跟茶灰色的玻璃門打個招呼，想照照自己頭髮濕漉漉時的樣子，門上密密的霧珠却只能反映出隱隱約約的倒影。「屬靈的人能看透萬物」，我對自己搖搖頭，不自禁的笑了。



STRUCTURALIZATION OF THE CHURCH

K. W. KAU

（編者按：本文是一篇討論教會制度化的文章。作者引用了很多青年團契面對的問題作爲例子，細緻地闡明教會倚賴組織去解決問題和過份著重效率的不妥當。編者希望讀者能對此問題來信討論。）

Introduction

It is now almost a matter of course that affairs of the church are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relevant committees or departments. At the same time, meetings have constitued the core of the ministry of the laity. All these, we are often told, are good and necessary. However, it is here suggested that they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structuralization, which is not all that desirable. Hopefully,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the assertion may be substantiated to your satisfaction.

The Context of Our Discussion

Firstly,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context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our subject. It shall not be in an imaginery perfect world. We look at structuralization in the present. Hence, we consider nonsense those arguments saying that something are not evil but for the human weaknesses.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orld as it is. Full account of existing failures and weaknesses must be taken.

The Meaning of Structuralization

The word "structuralization" is chosen to distinguish our subject from the word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system"..

It is not disputed that to have a church there must be some organization, however disorganized it may be. With organization there are bound to be some sort of structures. So, we do not oppos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System" is more ambiguous. It may be understood as "orderliness". Clearly the church must have its order.

"Structuralization" then is a descriptive term meaning a purposive effor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ll embracing, logical and efficient structure governing al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the Church as its aim.

Ah! immediately one may raise an objection. Is it not that before any structure becomes established, there must be a process leading to it? If so, is not the said process "structuralization"? If so, in taking away "structuralization" does it not also take away "structure"? If so, you are contradicting yourself!

To this, one need merely said that that is not what is meant. "Structuralization" connotates more than the mere establishment of structures but the fact of giving structures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Structures

Perhaps we may best start our discussion with "structures".

We have been led to believe that "structures" are merely means to get things done and are justified by biblical examples. Also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if structures have any undesirable effect it is because of the fallibility of the human beings in control.

On the question of justification of "structures" by biblical examples, it is submitted that the arguments that have been put forward, as far as the writer has acquaintance, are no more than quotations from the Bible plus some subjective explanations. We may leave it until a substantial argument is advanced. Let us now look for ourselves what "structures" stand for.

(1) Hierarchy

"Structures" in their present form are pyramidal hierarchical. At the apex is the reverend or the board of deacons while at the bottom are the majority of the laity. Between the highest tier and the lowest are numerous departments, committees, and sub-committees having diverse status and duties.

The pyramidal character of "structures" effectively means that the more important the decision then relatively the less will be the number of persons entitled to make it. Whatever explanation may be conjured up to support such a situation, an unmistakable fact is that it is assumed that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can adequately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a large group.

The above assumption is not borne out by our common sense. We all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another person in some depth, not to say that of ten or a hundred. Here we may meet an argument which in short says this: Since some persons are chosen by God, the Holy Spirit will enable them to do what is required of them as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God. With full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must say that it is indeed possible but improbable. We found Jesus himself, the truth incarnate, still took time to come to live with us to experience what we experience. Moreover, the symbol which Jesus chose to represent his ministry is the good shepherd who knows his sheep and not just sit there claiming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tell him.

Moreover, such assumption is exploded by the fact of employing statistical methods by some churches i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t is a confession that those who make decisions feel that they cannot know personally what are going on outside the meeting room.

Unfortunately, not every church can afford the use of statistics. In which place, we have the subjective impression and opinion, regrettably sometimes also individual prejudice of those who are present. There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higher the tier one goes, the less one knows about the reality. "Structures" with their heirarchical formation have fatal epistemologically limitations and lead to blind decisions.

(2) Spiritual or Secular

"Structures" stand for another assumption. It is accepted without question that spiritual affairs has practically no difference with secular affairs in the ways they are managed. Whilst the world conducts its affairs by numerous meetings and structures, Christians go about their ministry just in the same way. It seems that there was never any serious question as to whether structures, meetings or committees are the best or even the right way to carry out Christian ministry.

We often hear complaints about the inefficiency of church organization and wishes that better structuralization of a church would make things better. With great respect for the good intention of holders of the above opinion, we must wonder whether they really understand spiritual things.

It is a fundamental tenet of our faith that God is the originator and sustainer of our faith. Our perfection and advancement are with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How then can we assert that we can gain spiritually by the creation of structures?

Moreover, in the New Testament, we are never taught that structures are solutions to spiritual problems. Jesus came to save all man but he chose only twelve men to suceed his task. He did not set up a missionary society or a mission department. Paul exhorted the elders of Epheaians to be the examples of their flock but not the setting up of a string of departments to care for the needs of the Ephesian church.

It may be that in business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s are indispensable. In Christian ministry, it is not the same. Our model is Jesus Christ. It is personal service and care; just like a shepherd caring for his sheep. No shepherd would set up a committee to look after his shee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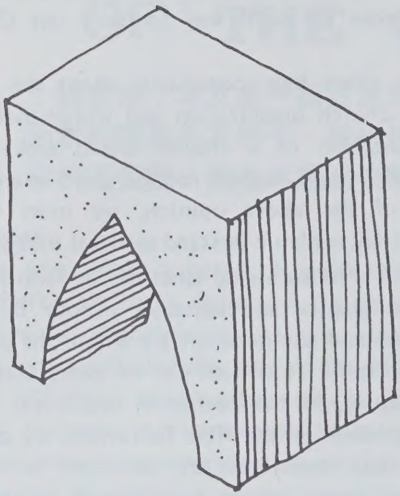
(3) Pro-efficiency and Pro-convenience.

Pro-efficiency and pro-convenience are inherent values in "structures" and "structuralization". These come in two ways.

First, it is due to the nature of "structures". When "structures" are erected or "structuralization" adopted as a policy, it is at least part of the reasons for so doing that such would do things better or make things more manageable. A thing is better done if it can be achieved with either less time or less resources which means efficiency. Things are more manageable if they are made more convenient. To forsake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in working by "structures" is to cut one's own ground from below.

Secondly, it is because of the pseudo-issues posed by "structuralization". With the erection of "structures", we have many technical decisions to make, for example, we want to split up one youth group into three, how we are going to assign the resources and people? Of course, the ideal would be to consult the wishes of each individual member, but it is manifestly inefficient and inconvenient. So let us

*Yet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poor tools to rely on to comprehend spiritual dimension of a church. They only give some answers which are conditioned by the questions asked and which are of ambiguous meaning allowing diverse speculations. More reprehensible is that such methods tend to abolish the human person. What statistics can show at its best is some general phenomena similar to the common factors in mathematics. 6, 12 and 18 have 2 and 3 as their common factors but neihter 2 nor 3 nor 2 and 3 together is 6 or 12 or 18. Similarly to have only phenomena without any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exist brings one to meet faceless phantoms not living human per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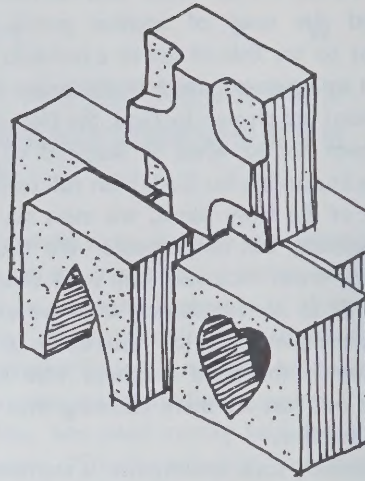


split it up by age. In less than an hour we can get it done. Very sensible, isn't it? Yes, indeed but once more we disregard the person of the members of that youth group. They are no more than vegetables when we put them into three divisions.

Well, one may ask why not follow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To this, the answer is that when a problem comes up within a structure, it often is not a real problem but a creature of the structures. It cannot be solved by biblical principles because it has its roots in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Perhaps an illustration would make it more apprehensible. To follow our last example, we now have three youth groups. Each has members belong to a certain age group. Let us suppose that they are successive in senorit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ystem of promotion according to age, that is, when a person reached an age which is the sphere of another youth group, he would have to go to that group. Should this be supported? Any obvious biblical principles? Or rather should we not first question wheth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group according to age is biblical?

Practically speaking, biblical principles are often irrelevant. It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deliberately ignored. The fact is that most decision-makers are not theologians and there is no time to look very deeply into the theological questions involved. Decisions must be made. So what is more helpful than the guiding light of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in places where the Bible seems to give us autonomy.

As we have already argued that spiritual advancement cannot be forced by human devices, giv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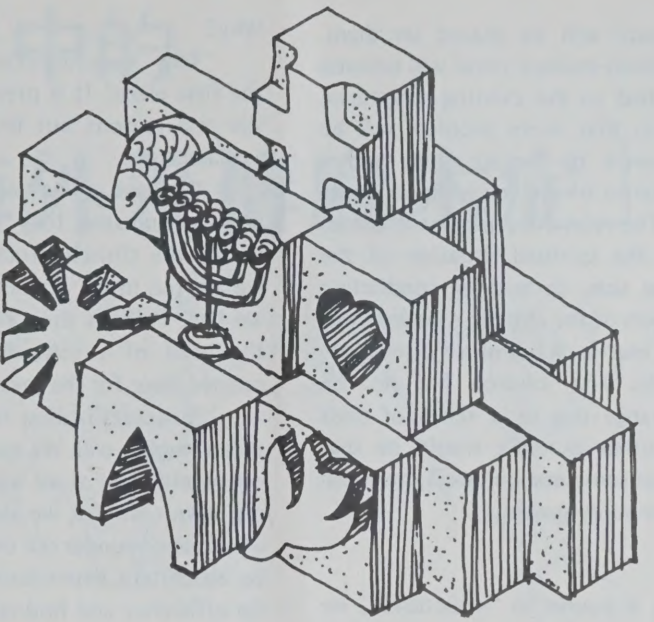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undue preference in our ministry means that we are straying further away from the divine will.

(4) Authority

Authority gives life to structures. Structures only function when those on the lower tier obey those on the higher tier. Authority commands the necessary obedience, which in turn cause decisions andpolicies to be followed and executed.

Where does the authority come from? It springs from a consensus which is fostered by the Church herself that those who are elected/appointed/ex officio decision-makers are leaders and their decisions should be obeyed because as leaders they are chosen by God. Whatever one may argue as to its theological soundness, the consensus, though often formal and superficial, moves the structures into action.

Authority exerted has its side effects. It divides the members of a church into classes and consequently gives each different roles. Those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make decisions are leaders. Those who are not are followers. This is everyone's experience who has ever joined a youth group.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plays the role of the leader and the rest of the members are followers. The leader makes decisions and the followers have only the choice to swallow or drop out. No initiative is expected from the followers except active-passivity, which means to says yes and be enthusiastic as to what has been decided by the leaders. This affects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a Christian. He will not consider that it is hi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deciding affairs which is part and parcel of his church life. He is led to believe that his opinion is immaterial. All he has to do is indeed "trust and obey".

In the circumstances, how can one expect the members of a church to be initiative and spontaneous? Rather, they become superficial, externally directed and weak in discernment. When the false security bestowed by their accepted authority is shaken by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y either become hypocrites or apostates.

****

Having seen "structures" in their true images, we may understand why "structuralization" should not be church policy but there are more to be said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structuralization".

Slavery of Thought

"Structures" condition human thought. With the epistemological limitation,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 decision-makers to approach their duty at a personal level. They are left with a vague impression of a faceless mass. Since we cannot deal with it as a living human being as it really is not, our only alternative is to deal with it as a phenomenon or the aggregate of some phenomena. For the same reason abovementioned, our perception of the mass is distorted and what we imagine to be the mass is in fact non-existent.

Further, dealing with a phenomenon means to employ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This is only common sense.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pplied have means analysis in terms of causes and effects. With causes and effects, we naturally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ways and means to eliminate or modify such causes and effects. Here, we are once more influenced by our heritage from the world. We again appli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a methodology not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the spiritual realm. Our analysis only lead us to a desperate search for means and method. Since spirituality is not within human control, all our means and methods are bound to be unsuccessful. We feel that we are in a cul-de-sac..

Another dimen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ization" is the distor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biblical teachings. A very good example is the word "fellowship". Due to our structuralization, the Saturday afternoon gatherings of youth groups are identified as "fellowship". This mistaken concepts is so entrenched that virtually for many "fellowship" can only mean a programmed gathering of Christians. To suggest that "fellowship" is a spontaneous and Spirit dir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s only serves to confuse "fellowship" attendants. For them, it is unimaginable that a "fellowship" can be something otherwise than a well structured group having a committee in charge and every gathering well planned in advance. Needless to say, the church life of a christian having such a type of "fellowship" must be pretty arid.

Finally, "structuralization" begets structure-superstitution. This is the final product. When "structures" are come to be accepted as good and useful,

more and more reliance will be placed on them. Simultaneous, the decision-makers' mind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attached to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We then reach a point that every problem will be looked at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ructure and a solution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same. An example may be as follows:–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of the church is on the low side. Instead of conducting family visits on members of the church, meetings will be held to discuss the matter. After much discussion, decision will be made. The solution will not be otherwise than to arrange one or a series of mass pastoral meeting. Another example would be that when a youth group has some non-believers, they will be dealt with by a Bible-study group.

Tightening Web

As our thinking is bound to "structures", we naturally in exercise our logic and good sense shall seek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s". They will be modified to make work more smoothly at the expense of all other values. Perhaps this explains why management studies are starting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hurch workers.

Having authority on its side, and conditioned human thoughts and behaviour, what is there to stop the perpetuation and perfection of "structuralization"? It is cold logic that one day the church will be so organized as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at we may find it appropriate to have a pope..

For the above reasons, is it not quite clear "structuralization" must be stopped? For this purpose, we may have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matter.

Why?

Why structuralization was allowed to start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pretended that the writer knows the real reasons but the following may be possible explanations.

We have already noticed at various points in the above disucssion how secular methods and values invade the church structures. This may indicate that we are too much dominated by the culture in which we live. Perhaps the Church has been insensitive to the need of a coherent theology of culture, thus opened door for the invas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alization is also an manifestation of our fallen human will. We cannot tolerate uncertainties in our world. Just as we want to subjuicate the earth for our own comfort, we also desire to put our spiritual environment under our own control. We feel uneasy to be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God. We plan, we strive for efficiency and find ourselves lost.

More sinister may be that "structur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building a large church where the pastor cannot care for everyone but must leave the majority to amateur workers.

All thes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it is time for us to turn around and look more closely and sincerely at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 and stop excusing ourselves for various reasons.

****

By way of conclusion,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answer the criticism of anyone who finds this article provides no positive solution. The writer does not intend to offer solutions. If what goes before is not merely a blind man's lament, then those wh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the service of God and His flock should give us an answer.

更正啓事：

上期（第二十六期）「簡樸生活── 一點分享」一文，是由莫昭友弟兄及莫陳詠恩姊妹聯合撰寫，特此更正。

更正啓事：

第二十五期「教會與學生工作」一文之作者實爲袁天佑弟兄，而「淺談學生工作」一文則爲王欣若弟兄，特此更正。

大專界中的「海外差傳麻木症」

曦凝



考考你對普世教會的認識、世局的瞭解：

1. 請在共產主義的國家上塗上紅色：
2. 在回教勢力的國家上塗上褐色：
3. 在天主教勢力的國家塗上藍色：
4. 在教會興旺的地點畫上一個十字架（十）。

凝視着這幅地圖，配上在電視耳聞目睹的世界新聞，不知你的腦海中湧現一幅怎樣的圖畫：屍陳遍野、腹大便便、眼睛放光的饑餓兒童，機關槍軋軋的掃射、街頭巷軋……？教會面對着世界，是無助？是悽然的哭泣？

在物質上，福音派的教會沒有爲貧困者做過甚麼好事。要救濟越南難民，也是送來一包包他們自己喜歡飲的奶粉、麵條（越南人是吃米的），好不是味道。越南難民湧來了香港，教會又湧進難民營，爲這群驚弓之鳥開佈道會，贏取失喪的靈魂，無視流離的彷徨、砲火後的痛楚。

在遵行傳福音的使命上，我只能說道：「千萬人未聽聞福音，千萬不知主名」。地圖上的小十字架，如何能忍耐地向他們傳講福音呢？把福音廣播的電波傳到空中便是完成了責任嗎？

我們不敢期望上一代的人去，然而這一代的青年人該如何負上這個責任呢？大專界這幾年是否矯枉過正地談關社，而完全忽略了「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的命令呢？

在香港的大專界基督徒中永難聽到一些弟兄姊妹獻身全時間當教會工作，更難聽到有人往海外作宣教士。爲甚麼在北美的URBA'NA有萬多的大學生獻身全時間事奉？爲甚麼他們那麼容易肯放下博士銜、名利去爲主工作。

我想起比我們年長約十年，在北美出版「泉源」的一班弟兄姊妹，他們同心積極地辦報，出小冊子。他們回港，亦在不同的崗位上起勁地工作。

我想起一位弟兄，他放下了在加拿大一間大公司的高職，回到香港後，又推辭了太古、怡和、和記的高薪邀請，寧願默默的在教會內事奉。

我又想起另一位弟兄，他在澳洲讀書時信了主，跟着全系的中國留學生都因他的佈道而信了主。團契由十多個人增長至二百多人。

爲甚麼在香港的大專界聽不到這些「故事」？

暫且撇下在校園的佈道不談，對着地圖，我實在覺得大專界基督徒應該考慮一下他們會否跑到海外當宣教士，堅強一些較疲乏的教會。

不知道爲甚麼，我個人亦一向對「差傳」、「海外佈道」這些字眼有些厭惡感，遙遠感、恐懼感。我的教會是一間很着重「講」傳福音的教會，主日崇拜的講道十次中也有五、六次是呼籲人去傳福音啊，發光啊。每年也隆而重之地開差傳年會，大叫青年人要獻身。不知是否聽得太多，耳朵發癢、心裏蒙油，我很誠心地感到很麻木，我唯一會做的是間中在禱告中記念一些不知名的宣教士，在做着些不知是甚麼的工作，求主叫他們不可灰心呀！堅忍呀等等。我也有嘗試看看一些差傳機構出版的刊物，瞭解他們工作的困難和問題，不過我這不大有智慧的人却很少會記得看過的東西，（特別是那些統計、數字），然後放在禱告中呼求。

再詳細的分析一下我的麻木感，可能會有以下的原因：

⑴唉，在香港都未好好傳福音，談甚麽到海外呢？——也許身爲中國人，多少受了儒家思想中「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影響吧！

無疑，在香港沒有傳福音的人沒有資格談到海外。但問題是有傳福音的人根本就沒有將普世的福音事工放在心頭。

⑵教會的差傳呼籲對年青人缺乏號召力（APPEAL）——青年人害怕聽一些僵硬了的道理，每逢講員叫我翻聖經到馬太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我的心便暗叫不好。「莊稼已熟了」的農業社會字眼對我們這群中子彈時代的人更是毫無親切感可言。

⑶責怪當地的教會爲甚麼不「生性」點，自己去向當地人傳福音呢？眞是不長進了！

這種態度與該隱的態度相似，「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麼？」

我也想到保羅：「我們被逼暫時離開你們，不過是身體離開，心却沒有離開。我們非常渴望再見你們。……我們既然不能再忍下去，……就派……提摩太去，爲了要在你們的信仰上堅定你們，勸慰你們，……打聽你們的信心怎樣，……。」（新譯本帖前二：17至三 :5）

⑷不滿上一代的佈道手法，也不滿上一代的宣教士祇顧及當地居民的物質需要，在當地的社會缺乏影響力，對當地政府的不義手段置若罔聞。

⑸不滿教會各自爲政，對海外宣教工作毫無默契。例如在荷蘭一地區內已有三個差傳機構各在其據地向當地有限的華人傳福音。

⑹大專界團契探索海外宣教之風不盛，年前雖有宣教士體驗團到東南亞各地跑跑，但帶來的影響似乎不大。港大團契也有一兩次邀請宣教士來分享經歷，但在弟兄姊妹間一同討論、思想這路向的人很少，沒有人帶起討論，便沒有火傳出來分享。

⑺沒有伴侶同去。很難抵受得住工作的壓力和海外生活的孤寂。

⑻在社會中工作了幾年，結婚生子，甚麼都安定了，很難放下高職厚薪、置富花園、教會執事的職位，去到蠻荒之境，住在樹上搖搖欲墮的木屋，烹調樹根草皮爲饍。香港是高度物質化、講享受的地方，有些基督徒連洗手間髒點也寧願多作忍耐，又怎肯跑到連厠紙也沒有一張的印尼去呢？

寫到這裏，我想到劉瑩基姊妹的飛機着火墜地，想到「劍橋七傑」，想到宋尚節博士在太平洋抛下他的博士學位文憑和金鎖匙。讓汪洋把它們淹沒。想到去南美洲當宣教士被土人殺死的JIM ELLIOT 說過：“HE IS NO FOOL THAT LOSE WHAT HE CANNOT GAIN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記着他在大學時是考第一的高材生）。

共產主義的勢力席捲東南亞，越南的門已關了，何時是泰國？何時是香港？印度在排華。門一度一度的關上來。八十年代將是一個更加紛亂的時代，也是一個爆炸的時代。

你，如何用你的一生，獻上爲世代心憂的上帝？

如何在基督的肢體中，彼此配搭，完成使命？

你敢帶着確信地唱出我們常「念口簧」的詩歌，「我要傳這快樂福音，到各處黑暗之地，對人人爲主作見證，指引罪人得亮光。」

亦希望藉着此文，幫助教會的長者，ICCF的幹事們，瞭解我們對「差傳」的麻木感，以新鮮活潑的教導，鼓勵我們，開導我們心中的疑惑。

第二十八期預告：

基督教與藝術

- ▲藝術是有閒階級的玩意？
- ▲從現代人的藝術看現代人心態
- ▲藝術？福音？文化？
- ▲大專基督徒與藝術
- ▲神學專欄
- ▲社會專欄

歡迎讀者投稿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20379號
發　行：突破發行組　電話：3-696411
九龍德成街二號A二樓
承　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03443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2

訂閱六期共十八元
海外訂戶　美金六元五角
港幣三十元正
（海外訂戶敬請用滙票）

請寄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20379號
橄欖出版委員會收

稿例

(一)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三)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四)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本刊不設稿酬。
(六)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一卷第五期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錄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　零售每本港幣三元正